

唐宋八大家故事集



变法通儒

王安石

► 东方慧子 主编

浓缩八大家风雨人生

风雅与深情 旷达与忧伤

天下雄文 品鉴不朽华篇

青少年心灵成长阅读精品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 宋 八 大 家 故 事 集



变法通儒

王安石

- ▶ 主编：东方慧子
- ▶ 参编：徐 敏 乔柏梁 司俊平
杨雪姣 唐卓琦 侯懿净

浓缩八大家风雨人生

风雅与深情 旷达与忧伤
天下雄文 品鉴不朽华篇
青少年心灵成长阅读精品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法通儒王安石/东方慧子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7(2018.9重印)

唐宋八大家故事集

ISBN 978-7-307-16288-4

I. 变… II. 东… III. 王安石(1021~1086)——生平事迹 IV.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9119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8 字数:87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5次印刷

ISBN 978-7-307-16288-4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王安石 (1021—1086)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江西临川盐埠岭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宋神宗执政之时，王安石任宰相，曾发动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积弊，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变法改革。

王安石在文学上也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问世。

前 言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文学巨擘。在明初，朱右最初把这八个作家的文章编选在了一本书中刊行，名为《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用了这八个人的文章。之后明朝古文家茅坤对前人的文章进行了整理和编选，最后取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闻名于世，他们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韩愈和柳宗元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欧阳修是一个文学奇才，他的创作非常丰富，是宋朝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的作家。苏洵抱济世之学，他在政绩上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为文却耀眼夺目，其文不屑蹈袭前人的旧踪，能够据前人皆知的史实，挖掘出新颖独到的见解。

苏东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为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但他仕途失意，屡遭贬谪，一生坎坷。


苏辙与其父、兄合称“三苏”，他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政论和史论。虽然他的才气不如其兄苏轼，但他的文章于冲和淡泊中蕴蓄着沉雄雅健之势，也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

王安石一生脚踏实地，做过很多小官，如知县、通判、太守等，后来当了宰相。他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男人，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王安石变法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也有人评价其变法是一场社会灾难。是非功过，千秋之后犹难论定。

曾巩“家世为儒”，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当官后，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做官的时间不多，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

他们的人生多难，政途不如意，但在文学方面却有着不可多得的才华。他们的文章不仅仅在唐宋时期非常有名，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非常高的造诣，对当今社会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韩愈的文章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的文章说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的文章唱叹多情，从容不迫；苏洵的文章纵横雄奇，一波三折；曾巩的文章淳朴平实，深切往复；王安石的文章锋利雄奇，绝少枝叶；苏轼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苏辙的文章委曲明畅，尤长策论。他们的文学成就反映了唐宋时期的文化，也为今天的青少年学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期望能使多数读者朋友不至于同阅读史料一样，感到枯燥乏味，而是从围绕史实故事、趣闻以及议论中轻松地了解到“唐宋八大家”的生平阅历、艺术成就。



本套书选取八位大家一生中的典型事件，向读者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人际交往、人品性情、处世之道、道德文章，以及生活中的趣闻轶事。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在阅读中既可获得文史知识，又能受到人生启迪。

本套书在编写过程中虽然倾尽全力，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会出现疏漏或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本套书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了前人撰写的相关资料，对他们的辛苦付出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5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天才少年	/	001
第二章	恃才傲物	/	008
第三章	初入政坛	/	016
第四章	当官为民	/	021
第五章	舒州通判	/	027
第六章	特立独行	/	032
第七章	屡求外任	/	036
第八章	上万言书	/	039
第九章	神宗皇帝	/	046
第十章	千古变革	/	052



目 录

第十一章	内忧外患	/	059
第十二章	变法失败	/	062
第十三章	固执己见	/	066
第十四章	不谙政事	/	073
第十五章	告老还乡	/	082
第十六章	归隐山林	/	088
第十七章	永乐兵败	/	091
第十八章	郁郁而终	/	096
第十九章	卓尔不群	/	101
第二十章	千古争议	/	105
第二十一章	文学成就	/	109

第一章 天才少年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身于临川一个官吏家庭。他的父亲王益，当时是临江军判官。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续弦。王益的第一个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只留下了两个男孩。

王氏家族并不是什么豪门大户，也没有显赫的族人。在王安石出生之前，他们家的家谱上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气的人物。

王益在大江南北做了几任的州、县官，不得不说，王益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他所任之处，当地的政绩都很不错。他为官清廉，虽然一生都在做官，但是没有一处田产，仅仅靠有限的官俸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因为没有田产，所以每次调任，他就必须拖家带口一起前往。

王益不仅为官清廉，对下属也严格要求，不许他们徇私，他判案时很少动用刑罚，史载他“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也不会体罚，都是耐心地讲道理。这样的家庭氛围，对王安石的成长有非常好的影响。

同其他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僚不一样，王益没有在任上跑官、要官，因此，无法同上司、地方官员和睦相处。有的官

员相互勾结、鱼肉百姓，嫉恶如仇的王益总是阻止官员此般恶行，压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不谙官场潜规则，他得罪了很多官员和地方大户，这些人都非常痛恨他。

王益的不识时务，严重影响了其他官员的切身利益，挡住了他们的财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益的行为让他很快遭到同僚的排挤。

王益的一生颠沛流离，始终得不到重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为官之道。在新淦县令、韶州知州任上，王益依然极力打压当地的好猾之徒，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

说到王安石的出生，据民间传说，其出生之时，家人忽然见到窗前掠过一个身影，好似一只獾，所以他的的小名又被称为獾郎，王安石也就被民间传说成“狐仙转世”。

传说毕竟是传说，“狐仙转世”绝不可能，獾的故事也有很大的虚构成分。但儿子出生，王益自然很高兴，只是那时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个三儿子日后会成为大宋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官至宰相，是北宋享有盛誉的文学家不说，更因发动一场变革而影响深远。

为何取了王安石这个怪名字，这也有一段故事。

相传王安石祖父病重期间，王益想将他葬在一块风水好、有龙脉的地方，便找来一位地仙帮看风水。地仙连看了三月，都没看准。因为地仙在山下看有龙脉，可是一到山上，就什么也看不出。

山上有一个靠打柴为生的樵夫，每天见地仙在山上转来转去，感到很奇怪，就问地仙是怎么回事。地仙于是跟樵夫说：“远看这山确有龙脉，到近处看，怎么也找不到，不知是何原因。”樵夫听后用手一指，说：“不用看了，我天天在这山上砍

柴，那棵大树下就是龙脉。”地仙觉得樵夫说得有理，立即告诉王益。王益按照地仙吩咐，在大树底下挖了一个坑，这个坑不大不小，刚好能放下一口棺材，坑的周围都是石，正好将棺材团团围住。安葬了王安石的祖父后，王益就给儿子取名王安石，意即此儿能守得住家里龙脉。相传这就是王安石名字的由来。

王安石幼年智力超群，记忆力尤其出色，他的两位兄长都是用了四年的时间才读完《尚书》，而他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读完了。

在私塾里，老师对他非常严格，由于他的聪明好学，老师对他实行了特殊政策，给别人限定课程，对他则放任，允许他随意扩大阅读范围。私塾老师不止一次当着王安石的面，对王益说：“此子断非池中物，迟早必成大器。”



王安石幼年经常被人称赞，王益听了自然十分高兴，他打算亲自试试儿子的才能如何。有一天，王益在屋内坐着，令人

将王安石叫到跟前，对他说：“很多人都跟我说，你非常聪明，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发现你的聪明在哪，也不相信你聪明。今天我就考考你，我坐在屋里，假如你可以将我从屋里叫出去，我就认为你聪明。”

于是，王安石走出屋去，尝试了很多方法，可是，王益仍一动不动。王安石走回屋，对父亲说：“爹爹，想要将您诳出屋去，真的是太难了！但是，假如您站在外面，我就可以把您叫到屋里来。”

王益笑道：“竟然不服气！那好，我就听你的，看你怎么才能把我叫到屋里来。”说着，他就走出屋了。这个时候，却听王安石笑着说：“爹爹，我已经把您诳出屋了。”王益一听，这才慢慢反应过来，只好承认自己的儿子是真的聪明。

然而王益依然不死心，觉得应该再试试他，就说：“就算是你把我请出来了。可是，你刚才说，假如我到外面，你还可以将我骗进屋去。我倒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安石说道：“好！不过，我现在要去一趟茅房，您得等一会才行，我很快就能够想出办法来。”

王益答应了。于是，王安石就跑了出去。然而，王益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到王安石回来，就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夫人从外面回来了，看到王益站在院子里，就好奇地问他：“天都要下雨了，你为什么站在院里呢？”王益就和她说了自己同儿子打赌的事。夫人笑道：“他刚才正在外面玩得高兴呢，可能早就将这事忘记了吧。他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哪会这么认真。”

王益一听，觉得有道理，毕竟是小孩子嘛，一时想不出办法，并且又看到了好玩的，忘了和自己的约定也是正常的，而

且夫人又在催促他，于是就进屋了。

谁想到，他刚踏入屋内，王安石就从外面跑回来了，笑道：“爹爹，你又输了！是我让母亲帮我的……”王益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承认王安石聪明。

相传王安石小时候就有远大的抱负和惊人的才华。一年夏天，天气炎热。教书先生给学生们出了几道题后，自己就坐在书案前闭目养神，随后呼呼大睡起来。学生们做完功课，见先生还在睡觉，便悄悄溜出学堂，到野外玩耍去了。村头有口水塘，名叫瑶池，塘水又清又凉，孩子们在王安石的带领下跑到塘里洗澡。小家伙一个个脱得精光，“扑通扑通”跳进了水里，顿时水花四溅，笑语欢腾，好不快活。老先生一觉醒来，看看天，星星都出来了，学堂里空空如也，知道睡过了时辰，便缓步走出学堂门。一阵清风送来孩子们的笑闹声，老先生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向前走去，上了一个土坡，只见孩子们正欢快地打着水仗，映在水里的星星一闪一闪，摇曳不定，老先生气得胡子直抖。

第二天上课时，老先生出了一个上联要大家对，对不好的学生要受罚。这个上联是：“弟子贪玩荒学业。”王安石站起来对道：“先生爱睡误弟子。”老先生一愣，又出了一个对子：“夜闹瑶池，搅动满天星斗。”暗示他知道学生们下塘洗澡的事了，并对王安石怒视道：“王安石，你来对！”王安石想了一下，从容对答：“晨破书海，重整万里江山。”

“对得好！”老先生转怒为喜，心里一高兴，对王安石逃学行为也就没有再追究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了少年王安石的天资聪慧。离他家不远的街口有一家面馆，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

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那天，客人很多，王安石只能坐在角落里，半天都没人理他。王安石肚子饿得咕咕叫，便去找老板说理。老板有心刁难他，便从伙计手中拿出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你的那碗面做好了，伙计忙，你自己去端吧。”王安石知道老板刁难他，也不计较，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

汤快要溢出碗外。老板不怀好意地说：“这碗面味道特别好，肉也特别多，至于你能否吃得上，就全靠你了。如果你能端走且不让汤流出，这碗面算你白吃，不收钱。如果你不能端走，或烫了手，我可不负责，而且面我会叫伙计端给别人。”王安石想了一会，立马答应：“这有何难？”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挑，把面条挑了起来，此时碗内只剩下半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美滋滋地吃起来。老板不禁为王安石翘起大拇指，面馆里其他人也都拍手叫好，均称：王安石真神童啊！

景祐四年（1037年），王益改任建康府通判，妻儿又一次随他赴任。这一次，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但是好景不长，两

年后，王益却积劳成疾，去世了。

父亲的早逝，对王安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居家守丧的这些年，王安石对自己作了深刻的自省，他开始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

陪同父亲十多年来不断宦游各地的经历，使青年王安石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对盛世之下的萧条景象百思不得其解，在丰年的时候，百姓尚不能够解决温饱，那到了荒年、灾年，又将会是怎样的呢？青黄不接之时，路有饿殍，朝廷官吏不闻不问，漠然视之，这种现象让王安石扼腕叹息。现实的无奈，慢慢让王安石的治学思想与人生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第二章 恃才傲物

在赵宋朝廷的有意引导之下，“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北宋太宗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贫寒士子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寒窗苦读。无论统治者的初衷是什么样的，毕竟身在底层的士子们有了一个可以参政、议政的机会。

宋初商业的繁荣使得当时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进士及第荣耀无比，成了很多有识之士渴望“当官为民”的必经之途。不同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热情越来越高，他们竞相投身科场，甚至有的人到中年依然在读书考试。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就算是孔孟复生，也必须要走进考场去挤这个独木桥，以期出人头地。王安石也不例外，他在父亲病逝以后，不再只是吟诗作赋，不关心国计民生了。然而，寒门士子的求仕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同其他学子一样，王安石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求学之路。

王安石听说宜黄县有一个叫做“孺云馆”的书院学子云集，书院的先生杜子野是非常有名的贤士隐儒，才华横溢，一心向学的王安石于是就挑着书籍行李，从临川来到宜黄，希望

可以向杜先生求学。杜子野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并且勤奋好学的孩子，虽然王安石的年纪还很小，但是杜先生仍然愿意和他一起欣赏精妙的文章，探究有疑点的地方，朝夕不倦。

有一天，王安石一个人在房内看书，当他读到“李白妙笔生花”的故事时，不禁心生向往：假如自己也可以有一支这样的神笔该有多好啊！能够用它来著书立说，为百姓谋利，为国家造福，一展平生抱负……然而，怎样才可以得到这样的一支神笔呢？王安石想了很久，没有一点头绪。

忽然，他一拍脑袋，自责道：“我真是糊涂，自己怎么能够想得出来呢，现在先生就在这里，我应该去请教他才对！”于是，王安石就拿着书来到了杜先生的书房。行过礼后，他向先生请教道：“先生，在这个世上真的有生花之笔吗？”

杜子野听他问话，又看看他手中拿的书，已经知道了他的想法，心中不禁暗想，这孩子还是太年轻，难免有些急于求成的心理，凡事欲速则不达，一切都需要勤奋刻苦，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积累才行！这孩子天资聪慧，如果教育得法，将来一定会成大器，但如果教学不得法，拔苗助长，也可能误了孩子美好前程，我需要好好地引导他。想到这里，杜先生就非常认真地对王安石说：“孩子，书上是不会骗我们的，在这个世上真的有生花之笔。但是，有的笔，笔头可以长出花，而有的笔是根本不能长出花的，凡人的肉眼很难分辨清楚！”

王安石看到先生这么肯定，心中非常高兴，就问道：“那么，先生能给我一支生花的笔吗？”

杜先生将所有的笔都拿出来了，很大的一捆，递给王安石说：“这里有一千支毛笔，其中有一支就是你想要的生花笔。但是时间太久了，已经混在一起了，就连我也无法分辨出来哪

支才是，你还是自己去找吧。”

王安石看到眼前有这么多笔，傻眼了，自己根本找不出来，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再次向先生施礼：“学生眼浅，请先生指教。”

杜先生假装沉思片刻，说道：“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一支一支地去试。等到写秃了一支，就换另外一支。这样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找到那支生花笔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

王安石听了先生的话，从此更加勤学地练习，想要赶快找到那支神笔。日子慢慢地过去了。这天，王安石又写秃了一支笔，他数了数，已经写秃了整整五百支，然而，看看自己所写的文章，感觉非常不满意，不禁很泄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支笔呢？

情绪低落的王安石不耐烦了，于是他又找到了杜子野先生：“先生，我怎么还没有找到那支生花笔呢？”杜先生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提起笔，写下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

王安石有点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了，不禁羞愧难当，此后他再也不找神笔了，而是用“锲而不舍”这四个字来鼓励自己，每天孜孜不倦地从书中汲取能量。有一天深夜，王安石读书读到动情处，有感而发，于是就挥笔写下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他感觉下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等到写成后，王安石读了又读，非常合心意，看着手中的笔，他心中顿悟，不禁高兴地跳起来，喊道：“我找到了！我找到生花笔了！”

至此，王安石才完全明白了杜先生的良苦用心：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生花的神笔，妙文华章只能通过辛勤的付出获得。如果想要有所收获，那就一定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锲而不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妙笔生花的效果！知道了这些，王安石更加勤奋好学了。

据王安石自己说，“某生十二年而学”。这句话实际上不是说他十二岁开始读书，而是说他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汲取知识。王安石读书博杂，才高志大，因此就有了恃才傲物的坏毛病。他瞧不起那些整天只会吟诗作对、寻章摘句的文人骚客。

他认为，读书，一是为了修身养德，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一个年轻气盛的少年，正是凌云壮志、满怀抱负的时候，在他眼里博取功名易如反掌，锦衣玉食也非常容易，致君尧舜亦非空谈。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安石沉浸于自己的理想世界里。

大宋朝经济繁荣，但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福祉，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贫穷。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出了问题，同时，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异常猖獗。王安石想，假如有好的生财之道和守财之门，那么，就可以做到百姓富足、国库充盈。官员如果都清正廉明，就不会欺上瞒下、中饱私囊，那么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可是，百姓如何才能得到一个有才干又能为百姓谋利的父母官呢，王安石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为百姓谋福利的父母官。



庆历二年（1042年），学有所成的王安石离开了江宁府，他去汴梁城参加了一场决定其一生命运的科考。

一天，王安石正在汴梁城某个房子内温习功课，为考试作准备，突然他被隔壁的谈话吸引住了。说话者虽语气平和，但话语间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沉毅与坚定。这个人也许真的是个有见地的人，王安石想，我得会他一会。于是他敲开了对方的门，在对方诧异的目光下，王安石看到这个人二十多岁，面庞消瘦，但目光却炯炯有神。王安石朝屋里的人作了个揖，道：“在下王安石，刚才在房里听到阁下的高论，甚合我意，故而唐突前来，想结识兄台。”

那人面带微笑说道：“在下曾巩，今日能有幸认识安石兄，幸会、幸会！”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促膝长谈。

在大宋帝国的都城汴梁，王安石认识了赴试的同乡——曾巩，当时两人都是白丁，却惺惺相惜，于是成了知己。曾巩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后，不禁击节赞叹，并且将王安石的文章给自己的恩师、当时执掌文坛的前辈欧阳修点评。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此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这种说法主要的依据，是根据王安石《上欧阳永叔书》做出的判定。当然这都不是很重要了。

在宋仁宗庆历初年，欧阳修的文名天下闻名，远播中外。如果谁的文章可以得到欧阳修的认可，那么作者马上就会名扬四海，前途无可限量。这次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无疑是给王安石一次成名的机会。果然不出曾巩所料，欧阳修看到王安石的文章后，便惊叹不已，频频点头。欧阳修竟然将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赠诗赞道：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欧阳修本来希望王安石可以继承李白、韩愈的功业，谁知，王安石却志不在此，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幸事，所以他在答诗中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王安石在答诗中委婉、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志向所在。欧阳修这样成名已久的大家，对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诗赞赏，王安石如此回答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因此，很多人觉得王安石不识抬举，恃才傲物。

王安石到底是怎么了？直到今天，这个人依然是一个无法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后世一些人出于政治需要，将他列入了法家人物的行列，但是，王安石似乎更像是一个“奉法反儒”的急先锋，实际上，王安石是一个深受孔孟文化影响的儒派人物，如果一定要往法家上靠的话，也只能说他是一个援法入儒的新儒。当然，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融儒、释、道三家之学于一身的新派宋儒。

王安石根本就没有心思做“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不希望自己变成李白那样的“诗仙”，他心仪的唐人却是被大家称之为“诗圣”的杜甫。王安石一直认为，作文就要务求有益于世，文以载道，这才是作文的境界。观王安石传之后世的文集，散文多以政论居多，可见王安石是知行合一、力行不倦之人。心中存了这样的念想，当然就不屑于做那种只知“雕绘语句为精新”的诗家了。

王安石的恃才傲物实际上是他内心凌云壮志的表现，虽然他也一样肯定李白的才华，但对李白诗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訾议。“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他却对关心民情、关心人间疾苦的杜甫心向往且景仰之。

同时人一样，在此期间，王安石也结婚了，不同于其他大文学家的苦情，结婚、中举两大喜事王安石一夜之间竟然独占，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王安石赴京赶考时，为了方便，到汴梁城东舅父家中借住。某天，他闲来无事，便到城里闲逛，忽见不远处吴员外门前门楼上悬挂着一只大彩灯，上书一副上联：“玉帝行兵风枪雨箭雷旗闪鼓天作证。”王安石念毕高声叫好，装模作样对了几个字，却无法全部对出，可旁边一个老人家以为他全对出了，便拉住王安石的手说：“公子，稍候，此对联是我家小姐征婚对联，已挂了好几月，但无一人对出，瞧公子相貌堂堂，我家小姐定然喜欢，容我进去通报。”说完便跑进门去通报。王安石一见此为征婚联，心中暗叫不好，赶紧溜之大吉。

第二天，王安石去应试，考完试后，主考官对王安石尤为喜爱，考后直接面试王安石，他指着厅前的飞龙旗说：“龙王设宴月烛星灯山食海酒地为媒。”命他答对。王安石一时抓耳挠腮，无法入对，他猛然想起昨天看到的上联，正好配对，于是便作答：“玉帝行兵风枪雨箭雷旗闪鼓天作证。”主考官见他这么快就答出来了，而且对仗工整，赞不绝口。

王安石考完回到舅父家听通知，哪知昨天老人家已在此等候，说我家员外等你等得心焦，快随我去，不由分说拉着王安石就走。

吴员外见王安石相貌不俗，心中煞是喜爱，便递上纸笔，请王安石写出下联，王安石无奈，便将主考官出的上联写出，吴员外念叨几遍，不禁大喜，对王安石说：“小女不才，只喜欢读书人，此对联是她所出，挂了半年，却从无一人能对出，今天公子既然对出了，就是有缘，老夫对公子也极为喜爱，如

若公子不嫌弃，就请成就此段好姻缘。”王安石舅父早就知道吴员外女儿生得闭月羞花，赶紧拉着王安石点头同意。

第三天是他们的结婚喜庆日，贺礼正举行时，大门外忽然鼓乐齐鸣，只见两位官差高声通报：“王大人官星高照，金榜题名，头名状元。明日一早，皇上亲自召见，请赴琼林宴！”

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一进入洞房后，王安石喜不自禁，便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两个斗大的喜字，并排贴在门上，乍一看去，就是“囍”字。他接着又吟诗一首：

巧对联成红双喜，天媒地证结丝罗。
金榜题名洞房夜，小登科遇大登科。

王安石双喜临门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四周，人们看到他的新房有两个喜字，于是也都向王安石讨要，以求沾点喜气，王安石自然来者不拒，一律满足。从此，结婚或家里有大喜事贴红双喜习俗就流传开来，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此习俗也一直流传至今。



第三章 初入政坛

经过艰难的科考之路，王安石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在入仕为官后，第一个职务就是淮南签判，治所在扬州。宋代选派京官充任各州、府的助手，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实际上，这个官职仅做些文件的收发管理工作，非常清闲。

王安石感觉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位置上有所作为，但是，眼下他无法改变命运，只能随遇而安，等待机遇降临。为此，王安石除了处理一些日常的公务，还将大部分心思花在了读书上。当然，王安石不是死读书，如何在读书中领悟到治国之道，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蔡绦曾在《铁围山丛谈》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扬州的官衙里，有一盆非常名贵的菊花，名为“金腰带”。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富贵花，能够知人富贵。花开的时候，一般吐三蕊，但有一天，却突然吐了四蕊。这时，时任知州的韩琦刚好手拿公文，在官衙的大院当中思考着什么，无意间竟然看到了这朵四蕊菊花，非常高兴，于是就请了当时同在扬州的王珪和王安石一道赏花，为了和“金腰带”里的四蕊对应，

韩琦又请了一个客人。然而，事有凑巧，这位客人由于临时有事没来。因此，韩琦只好和王安石、王珪三人赏花，谈笑风生。突然有人来报，故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出差路过，前来看望韩琦。于是，四个人一起赏花，言谈甚欢。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或许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蔡绦却偏要故弄玄虚，在故事结尾说：韩琦、王安石、王珪、吕公著四人先后为相，正应了金腰带吐出的四蕊之兆。蔡绦如此穿凿附会，导致这则笔记的味道全变了。

王安石在扬州任上的第一年，北宋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的呼吁下，仁宗皇帝采用了范仲淹呈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大部分建议，并且开始宣布变法，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用来整顿吏治的，他希望通过提高官僚队伍素质，缓和阶级矛盾，进而达到缓和危机的作用，稳定统治秩序。由于仁宗皇帝强力推进，一时间，大宋朝似乎出现了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

王安石对这次改革也寄托了非常大的希望，然而，他总觉得改革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够完善。由于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也无法提出更好的建议来，只能时刻注意这次改革的成效。果然，没过多久，由于“新政”针对的是官僚阶层，触犯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保守派的官僚以及那些受到打击的人向皇帝恶意攻击范仲淹，并且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有叛乱之心。

这些诬告和流言很快就动摇了仁宗皇帝的决心，改革半途而废，范仲淹无法继续工作，只能自请调到西北前线任职，富弼、韩琦等与变法有关的人也都被贬官罢职了。庆历五年

(1045年)初，新法都被废除了，刚刚有所好转的局面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新政”的失败让王安石感到非常惋惜，但是，也更加坚定了他欲行变革的决心。庆历五年（1045年）是王安石在扬州任上的第三年，此时韩琦被贬为扬州知州，成了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里记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按正常理，才能卓越、力图革新的韩琦是会对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王安石高看一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之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一种融洽的私人关系，甚至到后来，两个人由于政见不同，相互进行过攻击。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与韩琦这个当时的名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呢？一些宋人的笔记对此作了记载，大部分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王安石的品格不好，给两个人的关系造成了影响。但是，这些写笔记的人大部分都是与王安石有利害关系的人，或是不满其思想，或是沿袭他人观点，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客观。而且，《宋史》的编纂者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偏向保守，诋毁新法，所以，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就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因此也很难采信。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记载了关于韩、王二人的这样一个故事：韩琦任扬州知州的时候，王安石当时刚好是签判。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读书，有时候困了就随便趴在桌上眯一会，然而，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该工作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于是只能急急忙忙地往工作地点跑去，经常会出现不洗漱的情况。

韩琦见到王安石这样，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夜里饮酒作乐，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天他找了个机会对王安

石说：“你还年轻，应该多读书，不要这么轻易地放弃自己。”王安石听了之后，没有进行辩解，只是低头不语。而当他退下的时候，他对人说：“韩公不懂我。”



在以后的相处中，韩琦慢慢地发现了王安石的才能，想要收他为门生，然而，王安石无论如何都不同意。由于王安石性格单纯，简单而纯粹，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因此朋友很少。他一直认为，清者自清，不辩亦清；浊者自浊，万辩尤浊。另外，据说王安石在政见上经常与韩琦的意见不同，因而就产生了分歧。最终韩琦与王安石，这两个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风云人物，在朝夕相处中也就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私人关系。

虽然这两人之间没有能够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还攻击过对方，但是，这些实际上都是因为二人政见的不同而引起的，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相处和谐的地方。王安石的作品中，有数篇都与韩琦有关，并且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对韩琦的褒扬，没有丝毫的不敬之意。如他在《先状上韩太尉》中曾说过：“昔者幸以鄙身托于盛府，无博才以参筹策之用，有疏节以累含容之宽。”甚至，他还在后来的文章中批评了自己早年对韩

琦的偏见，他说：“久而再惟，滋以自愧。”赞扬韩琦有“忧国爱君之操，任民恤物之方”，所以能够“宾礼贤豪，包收疵贱”。

第四章 当官为民

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在扬州任上整整三年了，他的任期已满。因为和知州韩琦有矛盾，所以任期一到，王安石就离开了扬州，回到京师述职。

按照宋代的制度，进士高第（前五名）后，可以通过献文向朝廷请求任馆职。那个时代恰好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尤其是馆职，能够进入馆职的人都是文采一流的人物，并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入馆阁也成为了一条能快速升迁的道路。然而王安石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觉得自己缺少实干的经验，而且也没有丰富的工作阅历，他想先到一个地方进行试验，因此王安石主动要求外放至地方任职。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这时王安石已经二十六岁了。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县的县令，但这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因为从此他不再属于别人的幕僚，而是能够自作主张了。

在接到任命之后，王安石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这个小县城。刚一到任，他就马上投入到工作中。鄞县是王安石从政之后的第一个试验自己想法的地方，在治理鄞县的这段时间，他

将多年来积累的想法和抱负全都用在了这个地方，这个小小的县城也成了他最大的期望。

在鄞县任上，王安石的业绩非常突出，他将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派繁荣。王安石在鄞县任上做出的成绩最令人称道的是兴修水利。

王安石刚到鄞县时就发现，全县只要一到旱季就会极度缺水，特别是农业用水。按道理，鄞县是个水源非常充足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王安石决定弄清楚事情的原委，然后再找出解决的方案。

他共花了十三天时间来考察，走了数百里路，所到之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清楚地了解了当地农田水利的现状。通过这次考察，王安石对当地水利建设总体上有了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内心有了一个结论。

鄞县在五代时曾重视兴修水利，并且还设置营田官吏专门来负责疏浚河道，因此此地一直没有干旱的烦恼。然而，现在那些原有的设施大部分都已经荒废了，本地的官员们也不愿去考虑民生，不想解决问题，这就导致鄞县出现了干旱缺水的状况。出现这个状况并不是老天不作为，而是官员不作为。既然找到了事情的原因，王安石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很快出台了一套兴修水利的方案——开渠、筑堤。

各地乡民听说新来的知县要兴修水利，都很高兴。他们主动报名，干活也非常卖力。他们知道，兴修水利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干活，只要建设好了，以后就不会再担心旱涝灾害了。经过全县上下的努力，一系列水利工程很快得以完工。

为了纪念王安石的功绩，当地乡民把修建好的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海塘命名为“王公塘”。从此以后，鄞县的县民再也

不用担心干旱了。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王安石还施行了“青苗法”。王安石之后回京任宰相时推行的新法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全国推行“青苗法”，殊不知，他担任鄞县知县时就已经先行实施了，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至于为何全国推广“青苗法”失败，这个原因还真不好说。

王安石发现，只要到了灾荒之年，农民就必须向地主借粮、借款才可以度日。这样一来，就必须忍受地主的重利盘剥，最后，只能卖房、卖地、出卖劳力，甚至会出现家破人亡的情况，农民为此苦不堪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让他寝食难安。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决定在全县推行“青苗法”。

“青苗法”指的就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由官府将粮食借给农民，等到秋收之后，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且支付少量的利息，如此一来，农民就能够解决灾荒之年的贫困境况。这种方法一方面缓和了日趋紧张的社会局势，另外，也让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青苗法”推出后广受百姓推崇，切实改变了百姓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次成功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并且为他多年以后主持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王安石不仅关心民生，对教育也非常重视。他深刻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想要振兴国家，那么就必须要有人才，而人才之兴全在教育。

王安石对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作《慈溪县学记》，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一句。

他打破传统，将鄞县供人祭拜的孔庙改成了县学，并且到



处找名师来任教。王安石知道慈溪有一个名儒杜醇，字台石，这个人在当地道德学问颇高。于是，王安石就亲自去拜见杜醇，和杜醇详谈之后，他认为：“而吾所见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

为了能够请杜醇出山，王安石多次给他写信，并且在《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中，他声称：“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曰适于义，而惟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

最终，他用真诚打动了杜醇，杜醇答应到县城任教。由于王安石的重视，以及名师的教导，很快，鄞县县学就繁荣起来，人数多达二百余人。县学的开办为鄞县培养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风气，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可谓功德无量。

在王安石醉心工作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父亲王益还没有正式下葬，于是，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就抽出时间回到江宁，将父亲下葬。已经去世九年的王益，这个

时候才真正安息于牛首山，据说这个地方是他生前就已经选定好的。

安葬了父亲后，王安石还特意请挚友曾巩为父亲作了墓志铭。多年来萦绕在王安石心头的一件大事解决了，他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了。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曾为王安石生养过二男三女，其中长女便在鄞县出生，可惜的是，长女未满周岁便在襁褓中夭亡。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头胎便生了个女孩，可能会心里不高兴，可王安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儿女均为父母心头肉，做父母的不应该区别对待。他这种生男生女均一样的观点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为了纪念自己在鄞县担任地方官并初行改革，他为女儿取名曰“鄞”。

长女早夭后，王安石非常痛心，认为这是自己忙于政事，疏于看管所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视长女早夭为不吉利，草草埋葬了事，而是亲自选了一块上好墓地，并亲笔为亡女写了一篇墓志铭。王安石如此重情重义，当地百姓十分感动。

王安石在调任舒州通判前，想到女儿一抔荒丘将无人料理，内心十分沉重，于是写了一首《别鄞女》的诗：

年登三十已衰翁，满眼离伤只自攻。
今泛扁舟来诀汝，此生踪迹各西东。

上马赴任前，王安石在长女坟头痛哭流涕，并将此诗火化，以示告别。跟随来的人也不由得落泪伤心。

在鄞县任上的三年里，王安石已经将这个小县城治理得繁荣昌盛。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民谋福利，鄞县地区的生产、

生活面貌发生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在浙江省一枝独秀，令人赞叹。

我们似乎从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王益的身影。王益为官的时候，总是能够做到一心为民，所到之处皆有政绩，这对王安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也可以按照父亲的方式为民谋福利。

很多年之后，鄞县地区的百姓在鄞县“东八十步”修建了王安石祠，名为实圣庙，主要用来纪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祠内一直香火不断，至清朝仍存。直到现在，鄞县地区仍然有王安石乡等与王安石密切相关的一些名称，可见王安石在当地的影响之深。



第五章 舒州通判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被委派到了舒州（今安徽潜山）去做通判，但是，他还可“守阙”一段时间，以等待新机会的降临，但王安石却直接走马上任去了。

从北宋初年以来，已经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甲科高第的，那么，在派往外地任职满一任之后，就能够进呈他的某种述作，可以申请考试“馆职”，也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职事。由于入馆阁是跻身高级官员最方便的途径，因此凡具备此条件的人都会去申请考试“馆职”。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是以第四名及第的，因此，他也有这样的资格。然而，不管是在扬州签判任满时，还是在鄞县任满而回到临川家中“守阙”这段时间，他都不愿意申请入馆阁。当他在舒州任通判的时候，曾两次被召赴阙应试，他都推脱，请求让他终满舒州通判之任，最终，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

王安石在任舒州通判三年的时间里，做出了很多政绩，然而，现在可以考知的已经很少了，只能从他的两首诗中发现一

点他在这三年内的心理活动以及具体作为。

王安石在舒州不是一把手，因此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他都要请示一下上级，自己不能够越职言事。王安石不能掌权，就只好抽出时间去山里转一转。

王安石没有实权，大事无法自己做主，也无法替百姓分忧解难，他常常寝食难安。虽然非常同情农民，但是却拿不出非常有效的办法。

在诗的最后，王安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愿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尽力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诗写得非常朴实，没有“大江东去”的狂放与豪迈，然而却是王安石内心最为真实的表白。

一次，王安石向知州王琪提出在舒州放青苗钱进行救民，然而却被一口拒绝了。

王安石并没有就此放弃，官府不愿意出面，王安石想出了其他的途径，他请民间有能力的富豪大户出面借钱救困。当时各地大户的手中都有很多良田美地，具有这样的救困能力。

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政策很明确：“本朝不抑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往往“富有弥望之田”，而穷人则越来越穷，“贫无立锥之地”。

王安石在地方工作了多年，对这样的现象有很深的了解，曾作《兼并》一诗，王安石在诗中希望朝廷可以对兼并之家加以制裁和打击。在《兼并》诗成之后，王安石还写过一首题为《寓言》的诗，在《寓言》中，王安石说：假如谁家遇到婚丧嫁娶，但是没有钱操办，政府就应该借钱给他，解决他们的忧愁；假如谁家没有钱种地，政府就应该借粮食种子给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等到万物丰盈的时候，再收回本利，在物质缺

乏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帮助百姓。假如说做官的不明白这些道理，仅仅是空谈抑兼并，一点意义也没有。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安石抑兼并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救困、扶危、养民。为了可以向大户借钱救困，王安石四处奔波，然而，没有一点效果。

就在王安石为百姓到处忙碌、奔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访。这个人就是后来名声不亚于王安石的沈括。原来，沈括欲回老家钱塘为父亲沈周办丧事，这次是专门来请王安石为父亲写墓志铭的。当时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写墓志铭，都会邀请社会名流撰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王安石虽然官职不够显赫，但他的才情早就名满天下了。

王安石除了四处察访民情外，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忙于整理杜甫诗集。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少为人知的杜诗重新加以编订，编辑为《老杜诗后集》，并亲自作序，这对于杜甫诗的发掘和保存起到了相当有益的作用。

一天，王安石正在编辑《老杜诗后集》，突然，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地方官员。王安石在各县察访的时候见过这个人，知他正是舒州治下丰南县知县陈圣。这个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知县了，曾经因为夸大水灾而冒领救济款受到过处分，因此，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任满一届后，就要进行相应的考核。因此，陈圣花了很多钱，把全州上下的官员们贿赂了个遍，希望可以有机会再升一级。

陈圣见到王安石之后，非常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王大人，我看到您刚到敝地，生活上没有太多的照料，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请王大人笑纳。”

王安石当时就对陈圣道：“陈大人，我们都是为官之人，应当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黎民百姓，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那些正处困顿之中的百姓呢？”

陈圣点头笑道：“看王大人说的，您整日辛苦，在下仅表示一下心意，这是应该的。再说，我的这小心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心意，也是我们舒州全州百姓的共同心意啊，请王大人笑纳。”

王安石最痛恨这样的官员了，于是他就冷脸相对，把陈圣骂了出去，后来在陈圣的考核评语上写了四个字：“行为有缺。”陈圣的升官梦又一次破灭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找王安石开后门了。

宋时江南属富庶之地，经济发达，人情也较为复杂。王安石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些比较难断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斗鹌案。因为风气使然，在当时的城市里极其盛行斗鹌。玩得起这些东西的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如果有谁拿着一只上好的斗鹌从街上走，那应当是一件相当抢眼的事情。

一天，有个富家子弟弄到了一只绝好的斗鹌，于是整天提着斗鹌在街上乱晃，见人说：“此乃上好之斗鹌！”某天正好被他的一个好朋友撞见了，朋友要买这只斗鹌。这个富家子弟对这只斗鹌视若珍宝，说什么也不肯卖。结果，朋友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拿着跑了。这个富家子弟十分生气，拿着一把刀追到了门外，两个人一时起了争执，由于年轻气盛，这个富家子弟当街就把他的这位好朋友给杀死了。

此事发生以后，当地的官府判这个富家子弟故意杀人，依律，杀人偿命，应该斩首示众。被斩之家当然不愿意，就上诉，正好王安石巡回视察，拿到了这个案子。王安石仔细分析

了案情，又了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因为富家子弟的朋友偷盗在先，王安石秉公执法，对案子进行了改判，富家子弟保住了一条小命。

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在舒州的任期已满，在即将离开舒州赴京任职的时候，他没有了卸任时的轻松之情，相反眼里只有贫苦的百姓和无限的遗憾与感慨。

不难看出，王安石对舒州一任是非常不满意的，主要是由于自己没有实权，基本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所以，才会“白发行藏空自感”。



第六章 特立独行

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三十三岁。这一年，他被破格任命为集贤院校理。按当时的规定，这个官职是由地方官中通过考试选拔来任命的。然而，在文彦博等人的推荐下，皇帝决定不用考试就让王安石担任此职。一般来说，担任此职必须要在一年后才可以调任他职，然而，朝廷也特别允诺王安石在任满不到一年，即可以随意调任。

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他或许还能够升官，这无疑是皇上极大的恩宠了，如果换作其他人，早就受宠若惊了，然而王安石却连上两封奏章，再三陈述自己家庭的困境：祖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嫂子相继去世，两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家贫口多，家务繁多，很难在京城生活下去。

朝廷上下都非常欣赏王安石淡泊名利的品格，皇帝和执政大臣欧阳修也对王安石特别照顾。欧阳修还特意请求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司判官。在当时，这个官职要比集贤院校理稍有升迁，并且待遇也更加优厚，如此一来，就基本解决了王安石的经济问题。事已至此，王安石也不能再推辞了，只好赴任。

和大部分的京官一样，群牧司可以说是个闲职，虽说名义

上的职责是指导全国各地的养马场以及养马监，但实际上清闲得很。群牧司的长官叫群牧使，当时的群牧使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在这段时间，这个小小的养马机构聚集了很多贤能之士，但由于并无实权，因此大多时候他们只能无所事事，摆酒清谈罢了。

王安石家中比较清贫，加之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常显得很不合群。他穿衣很随意，一件皱巴巴的官服，很久都不知道换洗，每天就知道在衙门里抱着一堆书埋头苦读。这也就成了他被京官们嘲笑的原因。苏洵甚至说他“囚首丧面以读诗书”，意思是，他穿得像个囚徒一样，每天只知道看书，这样的人做事不合常情，必然是大奸大恶之人。

王安石专心苦学、不修边幅的形象，在叶梦得《石林燕语》中也有记载。或许他所描写的有些夸张，不过却十分传神：王安石的衣服脏了，自己总是忘记换洗。有一次，他和群牧司的同事吴仲卿等人一块去洗澡，同事看到他的衣服脏了，就从家里带了一件新衣服，偷偷地将他的旧衣服给换了。等到洗完澡出来，王安石拿起衣服就穿，根本就没有发觉自己的衣服被换了。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心思基本上都用在读书上了，照顾自己的能力很差，也不会享受生活。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有次去拜访翰林学士蔡襄。蔡襄不仅是当世有名的书法家，同时还精通茶道，听说大文豪王安石来了，赶紧把自己压箱底的绝品好茶拿出来，为王安石烹煮了一壶好茶。

王安石接过茶杯，喝了几口，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放下，从口袋中取出一个纸包，将包里的细粉末倒了进去，晃了晃，

然后又开始喝。

蔡襄不解，以为是王安石喝茶习惯添加一些东西，便问：“介甫兄刚才往杯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消风散，”王安石边喝边说，“有疏风养血、清热祛湿之功效，要不要来点？”

这下让蔡襄心疼得惊叫起来，大叫：“此乃上等好茶，介甫兄如此无异于暴殄天物，毁了我的一番好心呀！”

王安石将剩余的半杯一口喝下，徐徐说道：“茶乃解渴之物，哪来如此多要求，再说我觉得这样喝味道还蛮好啊。”

蔡襄被王安石一番话逗乐了，这才明白王安石既不懂喝茶，也不懂茶道，自己白费了半天工夫。之后他不再为王安石备好茶，因为他知道再好的茶，在王安石口里，不过是解渴之物。



《石林燕语》中的另一个故事更加传神：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夫人吴氏，说王安石非常喜欢吃鹿肉。吴氏说：“不会的，我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发现他爱吃鹿肉。”

朋友说：“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宴饮，他不吃别的菜，就把那一盘鹿肉吃光了。”

吴氏问：“你们将鹿肉放在了什么地方？”

朋友说：“就放在了他面前啊。”

吴氏这才明白，她告诉大家说，王安石吃菜的时候只吃面

前的菜，好菜还是差菜，他根本不关心，只要吃饱了就行。

东京宴会通常都有招伎饮酒的习惯，王安石对此非常痛恨。有一次，吴仲卿等人举办宴会，特意请了王安石。在席间，他们又招来几位歌伎，王安石一言不发，席间拂袖而去。从此以后，只要是这样的场合，官员再也不邀请王安石了。

王安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简朴、苦学、不好声色，并不是在装模作样，这些都是他真心实意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结果。他服膺于儒家的价值观，而且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第七章 屡求外任

王安石在舒州任满后，皇上命他在京为官，王安石依旧坚决推辞，后来在欧阳修的劝诫下才勉强接受任命。王安石的官职是群牧司判官。前文讲过，王安石不喜欢这个职位，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去了。

但任命刚刚下来，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当时，有一位馆阁校勘叫沈康，他在朝廷已经任职很多年了，他听说王安石是被破格提任群牧司判官的，心里非常不高兴，就直接去找宰相陈执中，希望可以让自己担任群牧司判官。

陈执中回答说：“王安石推辞入馆，宁愿将机会让给别人，朝廷看重他淡泊名利的品格，所以才特别给予恩惠的，这哪里是论资历来任命的？朝廷设馆阁，主要是为了优待天下贤才，应该以德为先，但是，今天你却直接来抢，和王安石相比，你差得实在是太多了！”这一番话让沈康惭愧不已，只得非常沮丧地离开了。从以上故事中可见王安石的品德在朝廷中的影响之深。

王安石任群牧司判官一职之后，认识了司马光。司马光，

字君实，是陕西人。他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也早两年中进士。就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样，北宋时代的两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身上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人都才华横溢，从小都博览群书，文采也都相当出众，似乎两人天生就应该成为朋友。当时，他们觉得相见恨晚，并且彼此非常欣赏，所以没过多久，两个人就成为了挚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讨论国家大事。如果有几天不见面，两个人就会觉得落寞不已，似乎少了点什么。

虽然有这样的益友为伴，但是，王安石的群牧司判官生涯依然是非常痛苦的。主要是因为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感到自己年轻有为，正处在大展宏图的好时光，理应为百姓效力，却不得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他感觉和这些京官在很多地方都格格不入，在官场上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根本就没有自己做地方官时的那种自在与洒脱。

王安石在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曾被朝廷任命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这个官职实际上也没有实权，王安石对此官职没有兴趣，就写了一封《上执政书》，仍然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同时，他还说自己一直要求外放，希望朝廷可以派他到地方去做一点实事，可以“少施其所学”。

王安石说，自己整夜都无法入睡，就在想如何能为百姓做些什么，可是又能做什么呢？他现在的工作状态仅仅是叹息自己在浪费百姓的粮食，碌碌无为。在这个清闲的位置上，就算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又能怎样呢？

他还经常回忆自己任地方官时的情形，日日夜夜不停忙碌，整天忙碌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虽然非常累，但是心里却特别踏实。他对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情都太深了，

他做梦都想回去。

王安石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碌碌无为的生活，因此，在任群牧司判官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大约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希望自己外放为官。

至和二年（1055年），他在答《钱公辅学士书》中提到，中个科甲，当个京官，只要不傻，谁都可以做到。读书之人，重要的是行道，能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给百姓和国家，这才是读书之根本。假如说不能行道，即使是天子，拥有天下，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在请求信中，他当然不能够写这些内容，他只能继续以家庭为借口，请求朝廷让他外放为官。过了一段时间后，王安石发觉这样的理由不行，就在请求信中说自己身体不好，适应不了京城的气候，要求外放。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实情。王安石经常苦思冥想，用脑过度，导致他经常头昏失眠。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庾禄赐之人，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在这封信里，他特意吐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盼望着可以为老百姓做些实事。

在十多次请求之后，终于，朝廷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

第八章 上万言书

王安石自进士及第以来，二十年的宦海浮沉，让他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阅历。回京后，他曾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财政部门属下掌管收支情况的官员，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

这个官职的职权非常大，必须对全国的财政情况有所了解。这份差事干起来也是非常累人的，王安石上任之后，几乎每天都要核算国家的收支情况，到最后，核算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朝廷的财政支出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官员和兵员的日益增多让财政支出出现了赤字。如果不加以控制，则势必危及江山社稷。

王安石满腔抱负，心系国家、百姓，发现了财政隐患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以杰出的思辨力和敏锐的眼光，隐约察觉到赵宋王朝在太平盛世的背后所潜伏着的重重危机。

这个时候，其他官员都在为自己的私利钩心斗角，而王安石则每天挑灯夜战，积极献言献策，经过很长时间的认真准

备，他写成了长达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任务作了一个透彻论析。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奏疏中是非常难得的佳作。其思想之深刻，论证之严密，思路之清晰，用词择语之精当准确，让人读后不能不为王安石的卓见和文采所折服。这篇奏疏不仅仅体现了王安石的写作风格，同时也为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持。无论后人如何评价王安石，都无法否认他在这一鸿篇巨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深的政治思想和高远的政治眼光。



在这篇轰动一时的万言奏折里，王安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朝廷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等一系列危机，并且深刻说明变法是形势所迫，分析了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缺乏合乎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极大的危害，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并建立一整套的教育、养廉之法以及纪律约束、法律制

裁、考察、赏罚等办法。文中他提醒仁宗皇帝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奸吏充斥、“官官相护”，国家法律不能得到有效的施行。

王安石在奏疏中讲道：“按现在的形势来说，陛下虽然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合于先王之意’，但是，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成效的。陛下是一个奋发有为之君，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再加上一番努力，本来是可以心想事成的，但是，陛下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人才。”

王安石还指出：“目前来说，国家的官员太多了，而财政的支付能力早就不能够承担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了。但这只是眼前问题，不可否认，现在的官员比以前多了一点，但这是造成国家财政贫乏的最终原因吗？不是。以前官员的数量要比现在少很多，俸禄也比现在低，但是，困扰朝廷的依旧是国家财政的贫乏。实际上，官员的俸禄，在国家财政中仅仅是一笔小钱。

“虽然我不懂理财之道，但是我也了解过历朝历代治理国家财政的方案，其实就是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才是充实国家财政的根本。

“如今，大宋久无战事，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按理天下应该是很富足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不管个人还是国家，都饱受着缺钱之苦，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理财未得其道’，这与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当前的富商巨贾们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将这些财富据为己有，不进行市场流通，最后导致了‘钱荒’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导致北宋财政贫乏的一个不

可忽视的原因。

“当今，朝廷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考试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记忆性的，这就使得当今读书人对于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仅仅靠博闻强记和略通文采他们就被视为茂材异等、贤良方正，认为是公卿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单凭这两点是根本不够的，治理国家一定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假如说，朝廷选拔人才仅靠这两点，这会让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样的人才其实不要也罢。

“我们来看看历代各个王朝，只要是坐拥江山，皇帝都会做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慎择公卿’，实际上就是慎重选取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朝廷的要职。这之后，再通过这些人进一步选取贤能的人作为他们的下属。假如采用这种办法来选取官员，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就都会有称职的人选了。假如让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当公卿，在各个部门滥竽充数，这样一来，所有部门的行政效率都会下降，并且，还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真正有才学的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

“实际上，诸如五经、学究、明法诸科，朝廷可以将这些作为必考的科目，目的是让人能够明智。现在朝廷又开设明经之选，用以选拔通晓经术的人。然而，这种考试，也是靠死记硬背和略通文采就能够通过的，根本无法选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王安石指出了朝廷推行恩荫制度的巨大弊端：“如果一个人做了官以后，就能够恩泽子弟，而这些被恩泽的人通常都没有丰富的知识，更不会有真正的才能，但是，国家却让他们去当官，不对其进行能力及人品的考核，这些官员往往只能

应付表面上的事情，很难做出什么成绩。

“国家对于庸才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通常会将他们流放到外地做官，让这些人无法在朝廷生存，‘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但是，现在这些人都被安排去主持州县之事，让他们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以我在地方任职时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数千里之间，很多州县官员都是从朝廷流放下来之人，没有几人是认真负责办事的，并且个个都摆出十足的官气，通过手中的职权来谋取私利。”

王安石坚决反对恩荫取士。他所进行的科举改革，被梁启超认为只是一时之计，然而，后来再也没有人能够继承王安石衣钵，进行科举制度改革，以致最后竟演变成为八股取士，与王安石的本意背道而驰，实在是令人扼腕！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说：“现在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方法不当，所选拔的人才不考察其道德方面，仅仅是问其出生的先后，论资排辈，依次提升；根本就不会考虑他称职与否，而仅仅是考虑任职时间的长短。另外，很多人不能够人尽其才，文章写得好的，却让他去搞财政工作；而搞财政还没有熟悉，又让他去搞司法；司法还没有理出头绪，就又调去管理礼仪制度了。”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甚至提出了高薪养廉的问题。当然王安石在当时提出的高薪养廉与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其依然明确体现了王安石务实的政治思想：想要整顿吏治，首先还得要拿钱出来说话。

王安石将人才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关改革的成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去改革，北宋必然会朝着衰败的方向发展，并且，不将人才改革作为改革

的基础，改革也必然是天方夜谭。王安石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人才的重要，然而，人才培养实在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培养出来的，他的改革也最终走向了失败。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甚至还指出了宋朝“崇文抑武”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宋朝的文化繁荣，达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每个人都以诗酒为乐，唱和为美。可以说，北宋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王朝，自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对武将的防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赵匡胤本身就是以武将的身份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的。他很害怕以后的武将也会像自己一样篡夺大宋政权，因此，他四处打压武将。北宋朝文臣的地位、待遇都要比武将高，最后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风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崇文抑武”直接导致了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降低，这就导致辽金政权屡次侵入中原腹地，掠夺财富，涂炭生灵，所以，王安石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军事思想，那就是全民皆兵，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来达到抵御外敌的目的。在当时，王安石能有这样的政治眼光，真是难能可贵。

“万言书”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改革之迫切性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剖析。

王安石认为，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会赏识自己的才能见识，从而支持他的变法。但是，这次他错了。暮年的仁宗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变革现状了。仁宗仅仅是在嘉祐六年（1061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任知谏院，王安石任知制诰，以起用新人来改善朝政关系，维护统治地位。

但是，王安石并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他知道，如果仁

宗不予支持，那么，他的改革就很难成功。所以，他又给仁宗写了一道《上时政疏》，疏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从当下的情况来看，重点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对不可以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的心理。另外，他还特别提醒仁宗皇帝，欲改变统治危机，不要过了今天，过了今天，恐怕就晚了。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北宋现在虽然表面上很太平，但是，却危机四伏，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断送祖宗创下的宏伟基业。

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时代，王安石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识、清醒的头脑、犯颜直谏的胆略勇气，实在是难得。在那个时代，他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政治家。然而，仁宗年老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且被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包围，根本无法提拔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第九章 神宗皇帝

治平四年（1067年），十九岁的神宗皇帝即位。神宗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帝王。我们说他杰出，并不是说他的治绩，他并没有能够扭转北宋王朝每况愈下的统治局势，但是，他同大多数平庸的君主是不同的，他性格比较强健，思维不拘定式，勇于进取。而且，他也是一个少年老成、绵里藏针、锋芒内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恰好，他的个性、思想同王安石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个人都是性格刚健、富于魄力、看不惯因循苟且的人；他们都不为正统儒家思想所蔽，可以旁窥诸子百家之言，通过自己的经验加以取舍。

由于好学深思，虽然神宗即位的时候仅仅十九岁，但是，他对当时的形势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有很多地方和王安石的改革不谋而合，比如说开国百年，承平日久，人心倦怠，积弊甚深。财政困窘是直接威胁政体运转的核心因素，政风吏治每况愈下，百官只求营私，不思振作，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百姓贫富差距太大，在官员的不断搜刮下，生活变得日益艰难，如果出现了灾害，必然会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同时，北辽、西夏就像覬覦在卧榻之侧的恶狼，岁岁攫取大量帛金仍无



法安心。可以说，朝政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朝中很多大臣也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他们忧心忡忡，希望寻找解决的办法。神宗即位才一个月，一个叫刘述的大臣就表述目前国家的困难。翰林学士张方平也上书言天下困极，朝廷却不图营救，假如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一旦出现饥馑或者边患，国家就将毁于一旦了。

关于改革，朝廷上下可以说达成了共识，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了。对这一点，虽然神宗涉世不深，但他心里有数，“庆历新政”已被废除，人们仍记忆犹新，范仲淹那样的能臣，都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何况现在的局势要复杂得多，因此，选一个能够靠得住的改革策划及执行者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神宗是个非常谨慎之人，对待人选他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比较，最后才真正确定谁是托付大任之人。进入他视野的有这样一些人：三朝元老富弼、御史中丞司马光、吏部侍郎吴奎等。在半年之内，神宗总是频频召见这些可能的人选者，在

秘密地进行考察。

他最先看上的其实是做过多年宰相的老臣富弼，这个人德高望重，当年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庆历新政，富弼此时官职为枢密使，但是，庆历新政的失败已完全挫伤了他的锐气。于是，神宗又看上了司马光。这个人名望很高，口碑也非常好，而且学识深厚。但是，神宗听了他的治国之要后，发现淡而无味，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觉得此人有些迂腐，于是将其淘汰掉。

再考察吴奎，觉得他为人过于软弱，无法承担重任。举朝上下，要不是保守、迂腐的人，要不然就是处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之人，竟没有一个人入神宗法眼。此时，神宗想起了最后一个候选人——王安石。

说来话长，神宗和王安石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渊源。早期，神宗的侍读韩维是王安石众多崇拜者当中的一个，他认为王安石为古今的神人，道德文章都是天下不可多得的。

在他的影响下，读书时期的神宗看了很多王安石的著作。而王安石的文章也非常容易感染读者，那些惊世骇俗、精辟独到的观点早就让青少年时期的神宗对王安石敬佩不已，再加上王安石特立独行、行高于众，以及他各种传说都传到了神宗耳朵里，很快，少年时期的神宗就对王安石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青少年时期是最容易崇拜人的，特别是那些卓尔不凡的特殊人物，王安石就是少年神宗心中的偶像之一。在那个时候，神宗早就想召王安石做自己的侍读官了，这样就可以朝夕得到教诲，然而当时并没有得到应许。

神宗即位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王安石的近况，他想深入了解这个心目中的“伟人”，可惜的是，王安石这个时候正卧病江宁，读书养志。

神宗知道，这个时候任用王安石这样的争议人物，一定会引起各个阶层的不同反应。他打算先摸摸王安石有多少民意基础，另外，也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他最开始问的是宰相曾公亮，他问：“为什么以前仁宗、英宗召用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总是称病，到底是不愿意出山，还是真的就有病？”

曾公亮听了这样的问话，揣测出皇帝有大用王安石的意思，他平时对王安石孤高清廉、为政有方也颇为欣赏，于是就说：“安石文才与学识俱佳，而且德行纯粹，应该大用。屡召不应，应该是身体不太好，不过也有可能是先帝用人之诚没有充分表达，陛下宜用恳切言辞召用他，这样他应该会来的。”

神宗后来又问了吏部侍郎吴奎，没想到的是，这个老好人的回答和宰相截然相反：“王安石是个典型的书生，他做事太过迂腐了，而且固执己见，并不适合辅相。如果他被重用，必然会做出一些大家无法接受的事情，进而导致朝政混乱，一发不可收拾。”

神宗大为诧异，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吴奎回答：“臣曾和王安石共同在群牧司供职，我对他非常了解，所说绝非虚言。”

神宗安排韩琦出京任职，在韩琦辞行的时候，神宗问他：“你走之后，谁可以继大任，王安石怎么样？”须发斑白的韩琦马上就说：“王安石这个人，做翰林学士倒是没问题，但是，处宰辅之地则器量不足。”

通过一系列调查，神宗发现，王安石还没有被重用，就已经有了很多潜在的政敌，是否起用，一时徘徊不定。

众官员对王安石评价不好，这当然和王安石的个性有非常

大的关系。王安石个性太强，他对人、对事都要求完美，不能容忍含混的状态。他坚持独立思考，不肯苟同他人意见。他一言一行都本着自己内心的标准来实行，不愿意因他人而违心，甚至不愿意因形势的需要而稍作退让，他认准了什么事，就必然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不会顾及别人的反对。由于他的思维方式太过极端，因此与群臣关系太糟。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代文豪苏轼的父亲苏洵，他最瞧不起王安石，在背地里经常说王安石的坏话。

两人的交恶源自一场诗会。

那一天，欧阳修打破身份，特意邀请京城那些诗文高手诸如王安石、梅尧臣、苏洵等人一起品酒论文。席间，欧阳修提出大家分别抽签作诗，分别含有“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中的一个字。苏洵很背，抽到的是一个“而”字。大家都知道，“而”字乃是一个虚词，没有实际含义，很难用在诗中。苏洵费尽心机，憋出了一句“谈诗究乎而”，意思是说，谈论诗歌要反复推敲。诗句一出，众人点头赞许。王安石看到大家都夸赞苏洵，一时兴起，也写了两句：“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傲兀何宾客？相忘我与而”。这两句诗一句立意高远，仿佛让人看到一头巨鲸劈波斩浪而来；一句语含调侃，把苏洵称为那傲视满座的客人。无论是哪一句，“而”字都能巧妙地融入其中。在场诸位一听，纷纷叫好。

一下子，王安石的风头就盖住了苏洵。苏洵很尴尬，自然心中异常恼火，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王安石留给苏洵的却是傲慢无礼的印象。自此以后苏洵在不同场合均不给王安石好脸色，甚至出语讥讽。而王安石也是非常生气，觉得苏洵背后说人，不够厚道，两人关系势同水火，成为死敌。

然而，作为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神宗对王安石的人品却更加坚信了。他痛恨那种死气沉沉、到处老好人的局面，他需要一个敢于排斥众议的强势人物，而具备这种素质的非王安石莫属，经过反复思考，两个月后，神宗皇帝发出了一道诏书。他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催促他尽快赴任。



第十章 千古变革

在赵宋王朝奠基之前，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仍，人们流离失所，几乎没有人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这就导致了读书人数量的减少。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为了维护皇权，皇帝强力推行崇文抑武、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可以平稳升迁，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官员都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等到他们达到了一定级别，还可以让子孙荫官，进入仕途。这样做有它的好处，那就是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引导大家都去读书，然而，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弊端，除了让全民族丧失血性之外，还让这个本来就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财力无法承担，加剧官民矛盾。

太祖太宗两朝，内外官员从来没有超过五千员，然而，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官员已膨胀到两万之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们，书读得当然很好，然而，能不能做事就很难说了。朝廷给官员们的俸禄非常高，几乎是用钱在养着一个机构臃肿，并且效率低下的官僚队伍。清朝人赵甄北评论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当时，宋朝的财政收支也非常混乱，除开官员、军队的庞大开支，皇室开支也是一笔大数目。宋代将全国分为十五路（后来分为二十多路），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中央派往各路官员叫监司官，每路不是一个监司官，而是四个，分别是：帅、漕、宪、仓。“帅臣”主要是安抚使，管军队；“漕臣”则是转运使，主要任务是将地方上的钱粮输送到中央；“宪臣”主要是提刑按察使，管司法；“仓臣”则是提举常平使，大致等于是省民政厅加省粮食局。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各管一摊，这样就把藩镇割据的可能性降为零。然而，如此一来，国家的管理成本就大大增长。各府、州、军、监的官员们需要巴结、打点的上级官员，由一个变成四个，需要出四份常例钱钞，仅仅是这样几笔开支，就已经导致了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

宋朝由于没能真正统一天下，且长期受到北方一些民族的军事压力，因此，也就必须大量养兵。宋太祖时养兵二十二万，而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已经增至一百二十五万。

除此之外，由于赵家的皇位来路不正，皇帝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就时时刻刻地防着武将们，并且采取“将不专兵”的政策，军官的驻地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变动，部队却经常被调来调去，这样可以防止军官将军队变成私家军，防止其对朝廷构成威胁，但是这样一来，军队的频繁调动，让军费开支增加了不少。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就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问题，简称“三冗”。

随着北宋统治的延续，“三冗”变得更加严重，再加上宋朝极为怪诞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到了宋神宗继位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异常复杂而尖锐的地步。为了改变这种

局面，宋神宗最后决定起用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开始为变法作准备，其中第一个动作就是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这还得要从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当初发动兵变夺得皇位，因此宋朝对武将的戒备心非常强，除此之外，对宰相也防得非常严。唯恐宰相权势过大，也会篡夺赵家的皇位。所以说，北宋一朝，皇权凌夺相权的情况非常严重。

北宋的宰相除了不能管兵权，甚至连财权也不能管，财权由“三司”管理。“三司”实际上就是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但“三司”不归宰相管，却可以直接向皇帝负责。

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个司，归自己领导，后来，干脆又将“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了中书省，如此一来，就将财政大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本来，“宰相不管财权”就是皇权限制相权最基本的体现，假如宋神宗不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是不会设立的。

“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了中书省之后，熙宁变法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变法的过程中，宋神宗还特别利用君权的力量来保证新法的推行，自熙宁二年（1069年）起，新法逐渐出台实施，果然，新法刚一出现，就遭到了朝廷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

司马光也开始攻击王安石，说他的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他们不只是从新法的内容、后果上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还从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

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尤其是在朝议的时候，宋神宗曾一度被其他老臣说得产生过一丝犹豫，不过还好，神宗最后还是不为所动，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

对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宋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他对于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非常痛恨，赞同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

在王安石同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宋神宗为了大力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给他搬开绊脚石，先后罢免了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其中包括：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又一次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之后，将涉及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方面的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面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现简要叙述一下。

一、富国之法

①青苗法。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



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②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

③募役法（免役法）。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④市易法。由政府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市场大商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⑤方田均税法。“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程度定级，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额。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⑥均输法。主要内容有：要求转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

远”的原则，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以节省货款和转运费等。此举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二、强兵之法

①保甲法。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同保人互相监督。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②保马法。政府鼓励西北边疆百姓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马有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

③将兵法。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名将官，每路置正副将各一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④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同时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⑤设军器监。政府下令设置军器监，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三、取士之法

①改革科举制度。废明经诸科，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治国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上，此举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了反对改革

的旧官。

②三舍法。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部分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同时整顿太学，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均推行此法。

③唯才用人。重用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打破按资升迁的成规。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养之”即培养人才；“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任之”即任用人才。

新法的实行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宋朝重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此为变法的前一阶段，也就是熙宁七年（1074年）以前，假如没有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以及锐意改革的决心，从而保证了变法的顺利实施。

第十一章 内忧外患

我们在前面说过，宋太祖赵匡胤以后周武将的身份，通过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从而建立了大宋王朝。赵匡胤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样得来的，所以，他势必要防止其他人通过同样的手段来颠覆赵宋王朝。因此在北宋初期，赵匡胤就不断增加兵员的数量，后来，竟然导致了北宋一朝严重的冗兵局面。

造成北宋冗兵局面的原因非常多，从客观因素来说，这也与北宋选取了一个无险可守的四面之地——开封作为自己的都城有关。

宋太祖赵匡胤选择开封作为都城，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我国自唐末的“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就开始慢慢南移，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给也大部分依赖于东南，这个时候如果仍以长安作为都城，物资的运输就显得非常不便，而且，加上唐末的战乱，此时的长安已是一片狼藉，呈现出一片衰败之势。如果赵匡胤选在长安定都，显然对全国的统治不利。另外，开封位于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物资丰富，应是定都的首选之地。

但开封地势开阔，无险可依，如果想要守住自己的风水宝地——皇城，就只能靠重兵把守。再加上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在北宋建国之时，幽云十六州还没有收复，周围的劲敌——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依旧对中原虎视眈眈，这些给北宋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因素都迫使北宋王朝只能通过重兵来守卫自己的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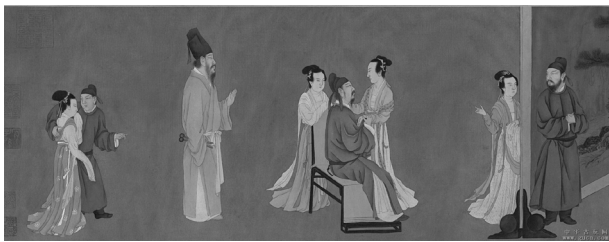
从主观因素来说，北宋王朝所沿用的是唐后期推行的募兵制度，这一制度在北宋王朝得到了全面的施行。这种制度不仅非常有效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也使得当时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北宋的募兵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每当遇到灾年和荒年的时候，北宋政府就出现了大量招收流民、灾民、饥民编入自己军队的情况。

对灾民来说，这种办法恰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他们不至于被饿死，而且，还使得自己的后半生有了一定的保障。对北宋政府而言，这种制度的收效是非常大的，编民入军不仅扩充了军队的数量，同时也避免流民聚啸山林，结为盗贼，反抗朝廷，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种措施可谓一举两得。但随之带来的隐患是，处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对峙中的北宋朝廷，必须要花费巨额的军费来养兵。很多人认为，北宋养兵的费用几乎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当时，北宋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对这样的财政分配有异议，而且北宋朝廷对武将的防范和兵员的配置、指挥等各方面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宋军的战斗力低下，每遇战事，宋军多溃不成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兵员的增多与低下的战斗力持续不见好转，这就逐渐演变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军队数量不断地增多壮大；另一方面，战斗力低下的军队让北宋王朝在当时群

雄角逐的战争环境中没有占到任何优势。

北宋一朝，除了养着大量的冗兵之外，还养着大量的冗官，冗兵、冗官、冗费三大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日益贫困，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太祖太宗所开创的盛世不仅没有维持下去，反而在北宋开国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比较典型的农民起义，就是淳化年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



民族矛盾是导致北宋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它的北边，除了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之外，在它的西北边，还有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

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逐出长城，但两次出征均宣告失败，对党项族的战争也是败多胜少，最后不得不用“岁币”的输出换取和平。

战争的失利，岁币大量输出，尖锐的民族矛盾，又更激化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相当严重的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些因素叠加最终导致王安石的变动无法推行下去。

第十二章 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然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将王安石刚刚调到京师，一些守旧派就感到王安石有可能被重用，于是，朝廷中出现了阻挠王安石参政的力量。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丞吕海马上就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的王安石才刚刚上任几个月，甚至连王安石的反对派司马光也感到非常惊讶，认为吕海有些操之过急。

神宗看完了吕海的弹劾文，马上就退了回去，弄得吕海非常难堪，不得不要求辞官，于是神宗马上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著代替吕海任御史中丞。

韩琦规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最开始有些犹豫，本来想同意韩琦的意见，但是，王安石马上就上书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让王安石非常愤怒，他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觉得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这才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反对派觉得，变法所针对的是那些地方富豪，并不是不应该，但不能过火，因为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假如把他们搞垮，一旦边境形势紧张，需要兴师动众，军需钱粮将没有着落。他们反对保甲法，担心保丁习武，一旦出现灾荒，保丁就会拿起武器造反，成为国家的大患。

对于青苗法来说，反对派认为这是在放高利贷，这样有损朝廷的体面，并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在推行免役法上，高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役钱，非常害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依然据理反驳，但难平众怒。

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论的说法，起因是在熙宁五年（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

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竟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试图通过一些自然异常现象来动摇神宗，打败王安石，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所以王安石勇敢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这种精神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

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彗星出现，这种正常的天文现象在当时被称作“妖星”，反对派在这个时候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对天象具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给王安石的变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这件事情是由一位看城门名叫郑侠的小官引起的。他本来

是由王安石亲自提拔上来的，但是，他在目睹了变法运动给老百姓带来的惨状之后，无法忍受，道德良知促使他必须要将实际情况向宋神宗上报，从而来解救百姓倒悬之苦。

按常理来说，在很多朝中大臣中，接连上奏折都没有让宋神宗改变主意、停止新法，而一个小小官员将情况上报，如何能够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呢？

郑侠在上奏折之前，也大费思量，思忖如何来写好这个奏折，怎么样才能引起宋神宗的重视，最终，郑侠选择了一个与其他大臣截然不同的方式。

也许他知道，宋神宗对普通的奏折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于是，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并且附言说，此图所绘都是他亲眼所见，民间流民扶老携幼之困苦之状俱是实情，请神宗观其害，罢废害民之新法。并且，郑侠还立下军令状：“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也就是说，他请求宋神宗废除新法，是在为万民请命。假如说罢废新法后，十天之内还不下雨，他就让皇帝斩了自己的项上人头。

从这一点来看，郑侠显然与那些变法反对派空泛的口水战不同——他敢于立下军令状，用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来反对变法。

宋神宗收到了这张图之后，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图上无数流民扶老携幼，身无完衣，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很多人身披锁械犹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百姓尸体奄毙沟壑，累累不绝……然而，面对这样的惨状，酷吏依然在威逼恫吓，怒目追索，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呼天抢地……

看完这幅图，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感到痛苦，但也很无

奈、很迷惑。宋神宗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却会导致出现这样一个“民不聊生、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结果？他不明白，变法运动到底错在哪里？

“流民图”绘出了天下黎民百姓的惨状，这幅画不仅惊动了神宗皇帝，同时也给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以口实，导致了新一轮请求罢废新法、贬黜王安石的折子像雪花一样飞来，同时这幅画还惊动了两位太后，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述说着“安石乱天下”的种种理由，恳请皇上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宋神宗不得不妥协，他将王安石降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而且基本停止了新法的施行。

吕惠卿等改革派则认为，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吕惠卿、邓绾向神宗进言说：“陛下数年以来，废寝忘食，成此美政，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他们几个人在神宗面前哭泣，神宗也认为，自己费了如此大的精力支持的变法就这样半途而废实属不该，于是，新法依然执行，只是方田均税法暂罢。

在这一次政治较量中，唯一被废除的方田均税法，也是唯一以遏制土地兼并为目的的新法，不伤害老百姓的法被废除，而伤害老百姓至深的法规却保留了下来。虽然在此之后，宋神宗又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但是，变法运动仍然时断时续，整个变法运动发展得非常缓慢，可以说新法已经失败了。

第十三章 固执己见

王安石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他被人家称为“拗相公”，也就是说，他的为人、文章、所持观点都和其他人不同，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王安石的执拗，还有个小故事。大宋至和元年（1054年），在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王安石进京做了群牧司的一名判官。在当时，地方官可以入京，被视为特殊的荣耀，但是，王安石对加官晋爵一点兴趣也没有。

进京的时候，他头戴斗笠，长袍半新不旧，似乎好久都没有洗，脚上穿着草鞋，与众大臣光鲜的衣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显得与众不同。

王安石上任没过多久，刚好是阳春三月，群牧司按常例要举行牡丹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群牧司的长官——包拯向他手下的官员们一一进酒。

包拯在朝廷里非常有威望，这些官员得到了长官的敬酒之后，大家都很开心，个个开怀畅饮，表示出喜悦之情。当时在宴席上，与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的司马光也在席间。

包拯来到司马光面前，斟满了一碗酒，请他干杯。司马光

面露难色，表示自己喝不了酒。包拯说：“我和你第一次饮酒，怎可推托？”包拯只说了一句话，司马光就全部都喝了。



随后，包拯又来到了王安石的面前，发现他的酒碗是空的，于是便往碗中斟酒，王安石却用双手盖住酒碗，说道：“下官一向滴酒不沾。”

包拯不依，非要斟上，但是，王安石涨红了脸，坚持不肯。

包拯说：“今日为牡丹宴，不多喝，也应该沾一沾。”

王安石非常执拗地说：“下官一滴也不沾！”此时众人纷纷前来相劝：“怎么能不给包大人面子呢？少喝也行啊。”可是，王安石一拗到底，就是不喝。包拯感到扫兴，他扔下酒杯，非常不高兴地丢下一句：“真是拗得可以啊。”

王安石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对权势从来不会趋炎附势，他不迷官恋权，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却宁愿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当一个小吏，并且屡次谢绝朝廷召他人京做官的机会。

在嘉祐四年（1059年），他做了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实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然而根本就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被迁知制诰。以后的两年时间，他便借故因丁母忧而解官回归江宁待业了。后来，他一直谢绝赴京师做官的机会。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

接班而不愿复官。直到神宗即位以后，神宗明确地表示了对他的欣赏，王安石这才开始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王安石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改革，首先是“清洗队伍”，起用新人，他竟然将自己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观点作为科考的题目，同时还将对变法的态度作为选人、用人的一个标准。很快，左右御史台被他清洗掉了大约有十四人，由此，一些保守派大臣就展开了对王安石的攻击。皇帝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就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虽然说新法的实施举步维艰，但是王安石依然坚定执著，这种精神不得不令人佩服。另外，他还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政治改革家，他洁身自好，对历代官员放纵享乐、贪污腐败的现象痛恨至极，尤其对当时士子们热衷纳妾的社会风气更是不屑一顾。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王安石非常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得知这个妇人是因家产卖尽却没有办法偿还官债，她的丈夫只好将她卖掉，好凑足赔官债的钱时，不禁非常难过。

王安石找到她的丈夫，命她丈夫将妇人领回去，甚至也没有让妇人的丈夫退还钱财。

王安石在官场不近人情的做法，被苏洵视为无比虚伪的奸贼：“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确实，由于他性格

上的另类与生活上的不拘小节，确实吃了不少暗亏。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宋仁宗殿试考生。这一年的殿试，是选贤良方正进谏之士。而这次应试中，就有四川的苏轼、苏辙兄弟俩。苏轼、苏辙都是非常有文采的人，很多人都觉得，第一名、第二名肯定是这两个人。初试后，没想到，兄弟二人并未夺得头彩，苏轼的考卷录为三等，而苏辙的考卷被视为不合格，原因是苏辙在卷中严厉地批评皇帝不关心西北边防、沉溺后宫、不问朝政，致使朝政日益黑暗，并且在引文方面不够仔细。

考官司马光非常欣赏苏辙的才能，于是重新审核后认为合格，列为四等，这才使得苏轼、苏辙被双双录取。但是，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则偏偏不给苏辙拟写“告身”（即授官凭信，似现在的任命状）。宰相就问他不给苏辙写“告身”的理由，他说苏辙以攻击圣上而中进士，自己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于是，宰相反唇相讥：“三年前，你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岂非攻击圣上？仁宗皇帝不是依然欣赏你的才能，破格录用你吗？”一句话，把王安石问得无言以对，只好暂时同意。

王安石的执拗体现在很多地方，他想干的事，无论反对者的势力有多大，他都会坚持下去；他不想干的事，就算是所有人都说可以做，他也不会去做。王安石最终也没给苏辙拟写“告身”，这样倔强的性格，难怪他得罪了很多人。

假如他仅仅是个小人物，执拗的性格也不是什么大缺点，可王安石却不同，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一个缺点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明显。

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想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然而，改革最后失败了，原因除了大地

主、大官僚的反对，以及改革本身的局限以外，他的执拗性格也导致了用人不当，最后让他的变法变了味，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例如他任命的副手吕惠卿就是一个见风使舵之徒，司马光早就告诫过王安石，此人不可重用，但是王安石就是不肯听。起初，吕惠卿是变法的急先锋，比王安石还“激进”，后来变法失利，吕惠卿反咬一口，说了王安石不少坏话，还故意出难题为难王安石。当然，这样的人在朝廷里还有不少，比如蔡确之流。

另外，变法还带来一个更为严峻的后果，变法将北宋王朝拖入到党争的漩涡当中，导致朝廷四分五裂。在“熙宁新党”的一边，除了王安石一人以外，这个阵营里都是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没有一个是正直的人。换句话说，神宗和王安石是带着一群心怀鬼胎的人在做事，其变法失败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而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阵营，这一边不仅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同时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在范仲淹改革时积极改革的旧臣。

当新一轮变法开始以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执拗已经发展成一种实现理想的狂热，无限的狂热让他无法看到政策执行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说“青苗法”，这个法令的初衷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甚至夸下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结果却是给农民增加了许多的负担，一个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对官员说想要借粮，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写申请表吧！”可是当时的农民多数不会写字，为了借到粮，只好花钱请书吏代写，写好之后便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农民为了得到粮食，只能一咬牙，再掏钱给

官吏好处费，这才借到了粮。可是，到了还贷的时候，一算利息，经过官吏层层盘剥之后，从官府借到的粮食，竟然比地主的高利贷还高！因此，“青苗法”已经完全背离了王安石改革的初衷，通过这一点，说明了王安石的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

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钻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结果使得王安石两次罢相，最终变法失败。

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民不聊生，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神宗无奈，只好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



石知道，这场大雨让他彻底失去了神宗皇帝无条件的信任。

后来，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在当时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了推行，当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从此之后，他抑郁而终。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敬而又可悲的背影。

第十四章 不谙政事

王安石在变法中制定的所有政策，一定要靠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可靠的官员来推动执行，作为个人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拥有在地方任职的实际经验的人，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这些经验，所以，在进行变法时，他首先对中央政府的一些政治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由于新法偏重于经济和财税，所以又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来大力配合新政的进行。另外，他还设立了“提举官”，主要是派遣官员到各地去监督、推动新政的实施。

虽然说王安石具有较为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但是他缺乏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行政经验，还有，他缺乏在人事协调方面的技巧，所以，在对人的能力及性格的判断上，经常会出现错误，这一点，从他在变法中的用人就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很合理，都很符合中央政府及老百姓的要求，这些也确实当时所需要的，其中一部分也是他任地方官时的成功经验。然而，王安石却认为这样局部的试点就可以通用于全国，实际上他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也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对于变革而言，无疑

是致命的打击。

秦始皇曾经把在秦国成功实行的法律制度在统一后的中国实施，最后导致国家在政权建设及运转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秦朝成为一个短命王朝的主要原因。

《宋名臣言行录》中有这样的记载：王安石为鄞县知县的时候，对读书和写文章很是用心。他努力进行水利建设，起堤堰，掘陂塘，官府贷给农民的谷物在偿还时，只需付很低的利息，这样做还可以使官仓里的谷米进行循环。他还创建学校，实行保伍制度，这一切都很成功。

新政在鄞县试点成功，让王安石看到了希望，但他没有意识到，以此新政实施于全国会产生什么问题，以及连锁反应的后果。事实上，中国的地方太大了，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都非常大，地方官的素质更是良莠不齐。在宋朝的时候，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所以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经济非常繁荣，而中原地区则处在一种严重的停滞状态。

或许有些地方真的需要新法，而很多地方根本就不需要，新法的实施反而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求稳怕变的人来说，就会出现各种顾虑，新法施行起来的阻力自然就加大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的政令很难真正有效、不走样地在各地区被照搬执行。

在新政的推行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与民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并且，官僚集团大部分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根本不愿让新政成功，这就导致了新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扭曲及偏差。比如说，“青苗法”本来是一种救济贫农的方法，王安石曾骄傲地说：“只要实施两

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不会出现春天无钱买秧播种的现象。”

但他的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并不一定是可行的东西。在实际的执行中，新法果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还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当年，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因为地域太过狭小，行政层次太过简单，所以可以非常充分地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他可以贷粮给农户，而且监督和管理官吏的成本也非常低，这就使得一个农业贷粮系统可以有效地施行。

另外，虽然没有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但是，像王安石这样有着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也不会利用职权搞腐败。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无法还本付息的农户，是不会强迫他们拆屋、卖地、卖儿卖女来还钱的。

地域狭小，管理层次简单，对信息的及时了解和分析，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些因素决定了“青苗法”能够有效地施行。然而，“青苗法”在全国实际执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青苗虽然只取两分的利，但是，农民实际付出的利息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了手续费，差不多达到七八分，要比理论上的高出好几倍，由于手续繁琐，加上其他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实际的利息甚至比高利贷还要高。据史料记载，利息甚至高达原来的三十五倍，可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恶劣程度已经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原先曾经是变法中坚人物的苏辙就警告过王安石：“青苗法的这些钱借给农民，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并不是为了让政府去赚利息钱的。一旦这些钱借出去了，也就在所难免地为某些贪官污吏制造了贪污的机会。国家虽然是明令禁止这样做的，然而，根本无法完全禁绝。还有就是，农民借到的这些钱就难免会用到其他地方，等需要还钱的时候，他们又拿不

出来。这个时候，须按照法律来进行惩罚，这也就给地方政府制造了麻烦。”

王安石回答：“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得从长计议啊！”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变法时，尽管也考虑到了执行的困难，但却过于乐观。

而苏辙在退出新党的时候曾经说过，王安石新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国家增加财富，然而，新法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忽略了人性的一面，而且也不会利用人的心理来处理事务，因此，想收到实际效果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再加上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的私心，层层盘剥，新法所导致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比如说，吕惠卿等人本来就不是真心变法，也不如王安石那样清廉爱民，他仅仅是一个投机的政客而已，因此在政策的执行上就容易发生扭曲现象。

王安石没有妥当地处理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而变法也没有将推行变法同整顿吏治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

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这一点来说，此举也许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那些只是指责新法过失，并无恶意的大臣，还有那些保持中立的大臣，也同样进行打击，一律予以压制，导致把反对的势力扩大化，把很多可以争取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推向了反对派的一方，从而壮大了反对派的势力，给自己的改革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这里仅举一例。王安石任知制诰时，曾和翰林学士滕甫一起担任开封府的考官。滕甫祖籍浙江东阳，他操着一口东阳方

言对一张试卷赞不绝口：“好啊，这篇文章立意好，文笔也不错。”

王安石很好奇，拿过来一看，觉得一般，却不好驳了滕甫的面子，便将此卷归入了一等。等启封后，才知道那张卷子为王观的。

王观与滕甫交好，王安石也认识，此人行事浅薄，狂妄自负，王安石对他一向没有好感，感觉着了滕甫的道儿，顿时大怒：“这王观平时和你关系不错，你想提携他也可以理解，直说便是，用不着来这套吧！”

滕甫见被王安石识破，急忙掩饰：“如果我是故意的，就让我的母亲得病。”

王安石听得一脸茫然，惊讶地看了滕甫半晌，这才平静地说：“凡事须权衡个轻重，怎么能拿自己的母亲来赌咒发誓呢。”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滕甫只得闭嘴。但王安石怕没说透，又加了一句：“这样说话和屠夫有什么区别呢？亏你还是个读书人！”

从此滕甫在朝中就多了个“滕屠”的绰号。滕甫由此对王安石恨之入骨。

王安石推行新法后，滕甫不问青红皂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反对派一方，不断给王安石制造麻烦，神宗不得已，将他调去定州任了知州。

滕甫刚一上任，也不调查研究，便直接上书神宗，继续反对新法，还大言不惭地说：“臣以前是揣摩着新法不好，现在到了地方上，才真切地感受到新法确实不好。”

滕甫反对王安石不遗余力，什么都能牵强附会，就连后来

定州大旱，滕甫都将它和新法联系起来，写奏本说：“新法违背天意，不得人心，所以才天降大旱，以示惩戒，该早早废除才是。”

而宋神宗出于权力均衡等原因，也会对王安石进行一定的牵制，使王安石对变法障碍的清除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反而让反对变法者不断得到机会，攻击、阻挠变法，最后让新法推行举步维艰。

变法之初，王安石不断提醒宋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宋神宗在表面上允诺，但是，又将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用来牵制和监视王安石变法，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这些人都是朝中的实力派，他们在等待时机，一旦取得权力，就开始全面废除新法。



王安石将变法的重点放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太急于推进变法，对变法的态度过于执拗，急于求成之下，他任用了一批道德品质败坏的势利小人，撤职、调离了一批反对“急进式”变法及主张“渐进式”变革的优秀官员，从而埋下了扭曲变法、人事纠纷和“窝里斗”的祸根，最后导致了变法

派内部出现了分裂，不能齐心协力。

变法失败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比如，王安石个人意志力特强，坚如磐石，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提倡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但优点过于突出往往就会变成缺点。改革不但需要勇

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而有时候后者更重要。

王安石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从不结党营私，但是缺乏斗争策略：一是不会团结人，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一律“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做到积极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对派，结果既不能得到朝内元老派的支持，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普遍理解，最终导致了被群起而攻之的下场。二是他做事过于仁义，对自己的对手只是逐出朝廷，至多是予以排挤，而没有置对手于死地，给了反对派卷土重来的机会。

就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日渐深入的时候，一场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旱灾从天而降。天灾无疑让变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当时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天灾是上天对施政者失德、违背天意的惩罚，许多变法的反对者也正在等待着天灾的降临。

当这场大旱来临的时候，饥民遍野，白骨累累，易子而食的惨景到处都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反对派认为，这种乱象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了天怒人怨，这使得本来已日渐平息的反对浪潮又重新高涨，就连一直站在变法派立场上坚决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也产生了动摇。

神宗皇帝在没有征得王安石等变法派意见的情况下，在上早朝的时候，直接颁布圣旨：在东京城广设粥厂，倾尽官府存粮赈济百姓；命各地官员迅速详细汇报各地灾情；新法暂停，令天下之人对新法各抒己见。

神宗的这些做法，无异于默许了变法反对派的意见，而暂停新法对王安石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不仅意味着神宗皇帝对他动摇信任的开始，更意味着他为之付出一生的宏伟事业遭遇了全面的失败。王安石并不在乎高官厚禄，也不在乎荣华

富贵，但他希望得到百姓们的认可，更希望看到国家的强盛，可惜这些愿望不仅没有达成，相反，却使得民生更加艰难。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安石没有了退路。他的新法被暂停，他在朝廷也被彻底地孤立了。从一个受人瞩目的高位一下滑落到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此时，不仅满朝的文武百官反对王安石变法，就连作为变法基础的老百姓也因为变法深受其害而怨恨王安石。

在王安石看来，他施行新法为的是富国强兵，他心里装的是整个大宋王朝，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也承认，他所推行的新法不是没有弊端，然而，任何事情都会有利有弊，自他执政以来，大宋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慢慢得到了好转，宋朝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然而，就在他打算纠正一些因为急于求成而造成的错误时，新法却被停止了。王安石是一个自命清高之人，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颜面继续留在朝廷里了，哪怕皇帝不驱赶他，他也只能辞职，回到家乡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辞职的奏折很快就呈上去了，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新法虽暂停了，但神宗并没有罢免王安石官职，不管怎么说，王安石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崇拜的老师啊。他跟王安石一样，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在今天，要罢免昔日的良师挚友，神宗皇帝又怎能下得了手呢？而且，罢免王安石也就意味着自己多年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他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吗？

神宗暂停了新法，让王安石的心里有了抵触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变法派的吕惠卿、邓绾二人进宫面奏神宗，仍然请

求继续推行新法，神宗犹豫不决。

吕惠卿声泪俱下地说：“几年来，陛下废寝忘食，推行新政，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天下百姓也一片赞颂，怎能仅凭一个狂夫之言，说废就废呢？如此一来，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变法图强，本来就是年轻的神宗皇帝梦寐以求的理想，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理想，所以才有了对王安石的提拔，最后才有了后面的许多关于变法所引起的风波。

神宗见两位大臣苦苦相劝，变法图强的意识又在他的头脑中占了上风，于是他同意继续推行新法。两人领旨而出，新法继续推行，而且力度比以前更大。而此时，在王安石一再坚持之下，神宗皇帝也接受了他的辞呈。

第十五章 告老还乡

从王安石当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他的变法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在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变法中，皇帝是帅，而他是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将军，按照人们传统的思维，皇帝是天之骄子，神明如神，是完美的化身。在这场变法中，假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要功劳必然要归功于皇帝，而一旦出现了差错，王安石就是理所当然的替罪羊。

王安石离开京城的时候，面见了神宗皇帝。两人单独在一起，四目相对却默默无语，谁的心里都很清楚，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彼此欣赏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君臣携手、叱咤风云的大变法时代已经宣告结束……

王安石心里很清楚，作为臣子，他必然要替皇上、替大宋王朝背起这个变法失败的黑锅，对于百姓来说，让他做替罪羊，将是舍车保帅的良策。

神宗皇帝内心也非常难受，两个人在大殿里互相凝视着，迟迟不肯出声，最后还是皇帝先开了口，他说：“爱卿这次虽离职，但变法还要继续下去，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朕还要请

爱卿回来主持朝政。”

王安石感到非常无奈，只好苦笑道：“臣真的是累了，这些年来，为变法耗尽了心力，就算陛下可怜老臣，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今日回乡，臣期待这一天也很久了，现在老臣终于可以安心地休息了。但是，唯一让臣不放心的就是变法大业，以后国家推行新法，就要全靠陛下了，还望陛下为天下苍生多多保重龙体。”

神宗恋恋不舍地对王安石说道：“爱卿走后，朕就好比失去了左膀右臂，没有了爱卿，今后谁能与朕彻夜长谈国家大事呢？爱卿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希望爱卿回江宁后好好调养，朕也不知道能够送什么给你，朕知道你为官一向清廉，家中积蓄不多，朕赐你黄金百两，安顿家室，望爱卿不要推辞。”

王安石感动至极，两行老泪顿时流了下来，归根到底，还是皇帝最了解他，像这样亦臣亦友的君臣之情，在世间恐怕难找。但是，就算他们君臣之间再惺惺相惜，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分离，王安石深深地叩下头去，含悲忍痛说：“老臣谢皇上。”

王安石去意已决，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墙，内心非常酸楚。本来，他是怀着干一番大事业、拯救大宋王朝的雄心壮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戴德之心来到京城的，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几乎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然而，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怨言，依旧忠心耿耿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当新法激起群臣的攻击，当对自己不利的言论纷纷涌来时，皇帝的动摇、眼中的疑惑、勉强的言语，都深深地刺伤了王安石的心……

王安石不是什么世外高人，他也无法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当作过眼云烟。在他的骨子里，有着文人的脆弱、哲人的敏感。他自尊、自爱，而且还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忧愁。他向往自由安宁，但他又放不下国家大事，这一切都在王安石心中进行着激烈的冲突。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最后却让他身败名裂，这就注定了王安石的一生是以悲剧收场。

王安石最初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好友都认为他可以一展宏图了。有一天，文武百官都登门向他庆贺，但王安石没有一丝的兴奋，甚至连房门都没有出去，徘徊了很久，取笔在窗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

王安石罢相后，曾与一位友人同游钟山，在小憩的时候，说起书窗题诗之事，王安石叹息道：“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说完淡淡一笑，这笑中包含了王安石太多的辛酸与无奈！这个时候，原来那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士消失了，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就在王安石告老还乡的途中，还发生一件趣事。王安石带着所有的行囊，与老妻静静地乘船回江宁。从东京回江宁，有水路相通，然而王安石并没有乘坐官船，他穿着便服去乘民船。在即将开船的时候，他对家仆吩咐道：“我虽然是当朝宰相，但如今已告老还乡，只要是停船的地方，有人问到我的官职，你们就说我是过往的游客就行了，千万不要惊动当地的官府和百姓，前来迎送就实在太不方便了。如果谁走漏了风声，必定是想敲地方上的竹杠，诈取民财，我知道了，一定不会轻

饶的!”众仆听了，大声说：“知道了!”

这时，一个名唤江居的家仆拱手说：“相公这样隐姓埋名，如果在途中听到了有人毁谤相公，那么，应该怎样去对待呢?”

王安石回答道：“常言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我好的，不足为喜；说我坏的，不足为怒，千万不要去招惹是非。”

他们沿水路走了有二十多天，后来，由于王安石因患病不适，最后只能同夫人等暂时分手，去走陆路，临别前他们约定到江宁江口相会。本来走水路回去还好，但是，自打走陆上后，王安石受了不少窝囊气，到处都不顺心。

有一次，在一个小镇上，他们主仆四人想找脚力，于是就到一个人家去雇。他们刚说明来意，那家的主人便摆手说：“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百姓四处逃散，连饭都吃不饱，谁家还养得起骡马?”

仆人就问：“你说的那位拗相公是谁?”

主人道：“他叫王安石，听说长着一双白眼睛，真是恶人有恶相。”王安石听了低头不语，转身朝外走去。听到了民间对他的议论，王安石心中非常烦闷，他到茶坊去转悠，却看到茶坊一壁题着一首绝句：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
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王安石一看，竟然是骂自己的，思索了片刻，又掉头走开了。他踱步走进附近一所道院，一抬头就看到了红墙上面贴着一幅黄纸，上前仔细一看，发现纸上写的竟然也是骂他的诗，说他“尽为新法误苍生”。

王安石无可奈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决定哪儿也不再去了，于是闷闷不乐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午饭后，王安石去茅房解手，竟然发现茅厕土墙上也有人写了八句诗，内容也都是攻击他的，说他排斥贤正，独断专行，倡言“三不足”，最后还是落得“千年流毒臭声遗”。

王安石实在气不过，于是便抬脚蹭掉了字句。他吩咐仆役马上收拾行装，提前赶路。一路上，主仆没有说话，行色匆匆，只顾往前走。

眼看着天色已晚，仆人上前问王安石：“相公，天已晚了，我们到哪歇息？”

王安石沉思了一下，回问仆人：“依你之见呢？”仆人答道：“要我看，今宵不必再宿村镇，还是借驿亭歇息好一些，省得生闲气。”王安石听了，点头称是。

这天晚上，他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个驿站住下了。夜晚，王安石睡得香甜，连日来的疲劳似乎都消散了。第二天一大早，仆人就忙着安排早饭，王安石独自在亭子间散步。忽然，他发现对面墙壁上题着两首绝句，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

他日命衰时败后，人非鬼责奈愁何？

王安石一看，又是在骂他的。这一路来，无论是茶坊道院还是村镇人家，到处都有人题诗讥讽他，人人都在咒骂新法，现在就连这驿亭也有题诗在诋毁他！想到这里，王安石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去问个究竟，于是，他就找来了驿卒问道：“是谁敢题诗壁间，毁谤朝政？”

一位老卒应道：“官人息怒，我们也不知道此诗是谁写的，有一天早晨突然出现的，后来才知道，不只我们驿站有题诗，其他的各个地方都有。”

王安石又问：“这些诗为何而作？”

老卒说：“据说，这些诗都是上面的官员布置下来的，说是王安石罢相还乡，一定要在各处都题诗相送。于是，就有一些人出来到处题写这样的歪诗，以图毁坏他的名声！”

王安石听罢，心中立刻明白了：原来这竟是他的政敌们在有意搞鬼！顽固派对自己和新法的攻击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这无关紧要，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只要新法能有益于黎民百姓，自己受些屈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到这里，王安石便微笑着对驿卒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到处去题写好了，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抹掉的！”打这以后，一路上王安石就再也没有去理会题诗的事了。

等他回到江宁后，昔日的老宅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墙头早就爬满了野草与枯藤，这衰败的景象同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凋敝凄凉。王安石太累了，在朝廷中多年的纷争，已经让他耗尽心力，筋疲力尽。坐在这熟悉的地方，呼吸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

第十六章 归隐山林

归隐之后，王安石暂时摆脱了朝廷的纷争，脱离了黑暗的政治漩涡。他可以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不需要再为国家大事而操心，当然，他也不需要为此而得罪人了。往日的恩怨情仇，现在已经成了过眼云烟，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牵挂和负担了，他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了。

辞官后的王安石开始慢慢地回味自己的大半生，虽然在辞官后他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但他明白，成败得失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生命和亲人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个时候，佛教给他的疲惫心灵带来了很大的慰藉，于是王安石便皈依了佛教，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促使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的爱子英年早逝。在这一系列重大打击面前，王安石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年轻时的锋芒已经完全没有了。他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心灵的避难所，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佛教的世界里，每天听高僧讲佛法，自己研习、诵读佛经，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减少一些痛楚。

王安石在晚年的时候，读的最多的是《维摩诘经》和

《楞严经》。《维摩诘经》认为，解脱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家，只要能够在主观上修养，那么就算是坐拥万贯家财，只要克制住自己的贪欲，广结善缘，积修功德，那么就可以令六根清净，灵智顿开；就算是妻妾成群，但只要能够一心向佛，就可以心地澄明，如同宝月。也许这一观点正好符合王安石的需要，所以王安石对《维摩诘经》非常喜爱。

对于《楞严经》，王安石也是非常喜爱。相传，王安石在江宁的时候，曾撰《楞严经解》十卷。《楞严经》阐述的是佛教心性本体论，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菩提妙明之心，只有视生为梦，视色为幻，才能破除各种偏见。王安石晚年醉心于佛学，生活很清净，这个时候他的诗句也呈现出了浓厚的佛学色彩。

王安石所信奉的主要是禅宗，他以诗言志，引禅入诗，写了大量的禅诗。这些诗词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随处可见禅的气息，有很多诗本身用的就是禅宗的语言。

元丰七年（1084年）春天，王安石生了一场大病，非常严重。曾经有两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乎到了不能动弹的地步。直到六月，王安石的病情才逐渐有所好转。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已近垂暮之年，他觉得自己多年经营的半山园现在成了累赘。于是，就在这年的秋天，他两次上疏神宗，希望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给寺院，以期为父母和儿子积功修德，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之后，他又将自己的俸禄与儿子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都一起捐献给了寺院，神宗还御题为“报宁禅寺”。

“报宁”的含意是非常微妙的，是王安石报熙宁（神宗）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此名意味深

长，让人感慨万千，后来，寺名又改为“太平兴国寺”。

王安石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当年宰相府中的显赫已经不复存在了，人生如浮云，人的出生也就意味着人的死亡，王安石早已参透了其中的奥秘。他现在只想平平静静、简简单单地过完自己的后半生。虽然成了佛教徒以后，他性格逐渐趋向平和，但他依然相信变法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他的各种做法并没有错。晚年的王安石生活较为悠闲，他纵情山水，谈诗论佛，却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煎熬和落寞之情。最痛苦的就是亲人的相继离去，先是长子王雾，接着是次子王旁与妻子吴氏……

亲人的离去让王安石失去了最为基本的感情寄托，他纵是再洒脱、再豁达也无法承受这种接连失去亲人的伤痛。然而，他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想要亲眼看着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的变法伟业在神宗的领导下重焕生机，恢复大宋王朝的宏伟基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安石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没能实现。

不久，他的侄婿叶涛匆匆地在江宁城找到王安石，还没来得及歇息片刻，叶涛就向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之后，皇上遭受巨大的打击，卧病在床的消息。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怔住了，呆呆地伫立在门前，望着远方，神情悲怆，两行热泪默默地流了下来。



第十七章 永乐兵败

当时的北宋朝，时刻受到北部契丹人的威胁，而且新崛起的西夏国在西北也时刻袭扰北宋的边陲安宁。从韩琦、范仲淹执掌西北军务的时候开始，北宋就一直致力于对西夏的防范，到了神宗时代，对西夏的用兵问题又重新被提到了议程上来。

最初，朝廷计划分五路兵马讨伐西夏，当时，王安石已经离开了朝廷，但变法派的中坚人物吕公著曾两次上书劝阻，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因此吕公著要求去职，他的申请得到了宋神宗的恩准，宋神宗任命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

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十八日，宋神宗派给事中徐禧和内侍押班李舜两位内宫侍臣到延州，担当将帅之职，这种用内侍之臣统领军务的现象，可谓宋朝用兵的一大特色。徐禧到了延州以后，上书朝廷，请求在永乐修建城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准，工程开始动工兴建。

三个月后，永乐城终于建成了，离原来银州治所二十五里，宋神宗赐名“银川寨”。这个“银川寨”是典型的大宋朝的“形象工程”，城刚刚建好，徐禧等人就回到了米脂，留下

曲珍统领一万余名士兵驻守。

为了装扮这个“形象工程”，李舜将运来的许多金银、钱钞和布帛放在这里充数，其意是向皇上夸耀，刚刚建成的新城已经非常富足了。

这个新建的永乐城紧靠横山，与宥州相接，是西夏人必争的军事重地。徐禧等人在此地筑城，他们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西夏人的警觉，城刚刚建成，西夏人就立即前来攻打。

曲珍见军情紧急，立即派人向徐禧报告。徐禧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他原来一直在内廷，不了解军务，听到有人报军情，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相信，然后又说：“如果西夏兵来犯，正是我立功求取富贵的好机会！”可是，说归说，他毕竟没有实战经验，所以一直迟迟不发救兵。边境守兵飞马禀报了十几次之后，徐禧这才带着李舜等人懒洋洋地出发。

大将高永亨是一个懂得用兵的人，他对刚刚建成的“银川寨”很不看好，他说：“银川寨城小人少，又没有水源，恐怕守不住。”但他却因这句话而惹来牢狱之灾。

原来，高永亨虽然懂得军事，但他却不懂政治，“银川寨”既然是徐禧献给神宗的“形象工程”，自然容不得被人质疑。高永亨说的虽然是实情，但徐禧却认为他在动摇军心，于是将他戴上镣铐押送延州监狱。

西夏人为了争夺这个咽喉要地，竟倾一国之力，志在必得。徐禧登城西望，见西夏国号称三十万大军压境而来，浩瀚的旌旗一眼望不到边，不禁心慌。

九月初九，西夏军队渐渐逼近，高永亨的哥哥高永能请求在西夏人还没有完成列阵的时候率兵出击，可徐禧却说：“你懂什么！大皇帝的军队不闻鼓声不成军阵。”于是派了一万士

兵在城下列阵，徐禧自己坐在城门楼上，手执黄旗对大家说：“看我的旗子行动。”这时候，西夏军分几队向宋军发起进攻，兵临“银川寨”城下。

曲珍见宋军在水边列阵，地势对宋军非常不利，将士都面有惧色，于是他对徐禧说：“今天大家军心已动摇，不能战，战必败，请收兵进城。”

徐禧却说：“你身为大将，怎么能遇敌不战，先自己退缩呢！”

过了一会儿，西夏军派出铁甲骑兵渡河。这时有人禀告：“西夏的铁甲骑兵号称铁鹞子，凶悍无比，我们只能趁他们渡一半时袭击；如果让他们渡过河来，其锋芒就难以抵挡了。”可是徐禧却不肯听。

当铁甲骑兵过了河之后，他们纵横冲杀，宋军大败而回，奔逃入城。西夏人乘机大举进攻，宋军大败，寇伟、李师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和十余名使臣及八百余名士兵全部被歼。

曲珍带残兵入城，因为山崖高峻，道路狭窄，西夏铁甲骑兵越崖而上，丧失战马八千匹。西夏人久攻不下，于是就包围了永乐城。

起初，沈括向皇帝奏报说西夏人进逼永乐，见朝廷军队齐整就退回去了。

宋神宗说：“你对敌人的估计太疏忽大意了，他们来了后没有出战，哪会马上退兵呢？一定是有大军在后面。”结果跟皇帝估计的情况一模一样。

十七日，宋神宗下诏，命令李宪、张世矩带兵去救援永乐城，又命令沈括派人与西夏谈判，只要西夏人退兵，一切

都好说。

西夏人包围了永乐城，围兵有数里之厚，游动骑兵到米脂抢劫，并且占领了水寨。守城将士昼夜血战，城内缺水已好几天，大家凿井也找不到泉水，大半人因渴而死。当西夏人用云梯爬上城来时，士兵们还在捂着伤口与敌人继续战斗。

沈括、李宪的援兵和粮饷都被西夏的游动骑兵所阻断，永乐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曲珍估量城守不住，就向徐禧提出，乘士气未竭，突围而出，让人各自逃生。

徐禧却说：“这个城池地处要冲，怎么能放弃，而且身为将领，自己逃命，那军心就动摇了。”

曲珍说：“不敢爱惜自己性命，只是朝廷救命使臣一起死在这里，怕辱及国家。”

高永能也劝徐禧拿出所有金帛来奖励壮士，力图冲出重围，但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西夏人让曲珍来讲和，吕整、景思义两人相继被派去，西夏人剃了景思义的头发，把他关了起来。

二十日夜晚，大雨滂沱，西夏人环城急攻，永乐城最后陷落……高永能的孙子高昌裔劝高永能从小路逃出去，高永能叹息着说：“我从年轻时就和西羌人打交道，打仗从未失过手。现在我已经七十岁了，一生受国家的大恩，自恨没什么可以用来报答，这里就是我该死的地方了！”说完，他找来士兵的衣服换上，然后与敌人作战而死。

徐禧被乱兵杀死，曲珍光着脚逃出，免遭一死。说起永乐兵败的罪魁祸首，当数徐禧。徐禧喜欢谈论军事，经常说：“西北唾手可取，只恨将帅胆小而已！”为此吕惠卿极力引荐他，所以他受到破格提拔。



十月初一，沈括、钟惺上奏说：“永乐城陷落，汉、蕃将官二百三十人，士兵一万两千三百余人都战死。”宋神宗见到奏书之后悲愤落泪，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早在宋神宗任命徐禧时，王安石就上书进谏说：“徐禧志大才疏，一定会贻误国事。”宋神宗没有听从。等到永乐兵败，宋神宗总结道：“王安石经常劝朕不要用兵，少兴案狱，朕却没有听啊！”

自从熙宁年间开拓疆土以来，大宋一共得到西夏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座城堡，而灵州、永乐之战，使得官军、内附羌人，还有民间保民死亡人数达到了六十万人，花费钱粮帛绢以万计算，不可胜数。宋神宗到此才意识到，边境守臣担当不了重任，深悔用兵错误，从此再也不敢轻言西征之事了。



第十八章 郁郁而终

永乐兵败的消息更加让王安石寝食难安，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尽管他现在远离朝政，不问政事，但时局毕竟是他变法之后而导致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的胜利实际上就是王安石的胜利，神宗的失败同样就是王安石的失败。他不敢想象，如果政局一直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自己该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又有何颜面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担不起千古罪人的罪责啊！

王安石现在非常痛苦，本来就身体孱弱的他变得更加弱不禁风。王安石变得更加苍老，日渐消瘦，身体每况愈下，没过多久，他就病倒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神宗那里，神宗派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到江宁探望王安石。蔡卞的到来让王安石的心情缓和了不少，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懑和抑郁也得到了舒解。他立刻盛情款待了蔡卞，翁婿两人谈了很多，从政治到文学，当然，谈到最后的还是国家大事。

蔡卞不经意间说漏了嘴，他谈到了朝廷在讨论立嗣的问题，此话一出，蔡卞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本打算

避开这个话题，没想到还是说了出来。

王安石一听就呆住了，整个人坐在饭桌旁，就像是一具雕塑一般，面无表情。

本来，宋神宗和皇后的关系很好，两个人非常恩爱。据史料记载，两个人二十年不曾面赤，夫妻相敬如宾，生活得其乐融融。

神宗的妃子也非常多，先后生了十四子。怎奈何他的家庭接连遭遇不幸，先后有八个皇子去世了，而剩下的皇子此刻还都是孩子，年纪太小，根本无法挑起国家的大梁，这让神宗颇感苦恼。后来，神宗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身体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因此朝廷上下就开始讨论立嗣的问题了。

立嗣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个问题王安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时候，神宗才刚刚三十五岁，正值壮年，满朝文武百官就开始讨论起立嗣问题了，看来，皇帝的身体确实是出现了大问题。虽然他在朝的时候，经常会和皇帝闹得不愉快，但神宗终究还是他的伯乐，没有神宗，也许他到现在也只是一个山间野夫，纵然满腹经纶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在他归隐的这几年里，他经常能想起来的，还是神宗对他的种种知遇之恩。

元丰八年（1085年）初，神宗的病情加重，朝廷上下已忙成一片，太医不分昼夜地守在神宗床旁，给他诊脉熬药。宫外的百姓也听到了皇帝病危的消息，议论纷纷。

在封建社会，皇帝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皇帝的龙体健康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与兴盛。忙于为神宗治疗的不仅有太医，还有很多僧道，他们做祈福道场为神宗祛病。

三月，神宗已经没有办法处理朝政了。最后，经过文武百官之请，他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皇六子立于帘外。

三月五日，神宗皇帝驾崩了，年仅三十七岁，壮志未酬的宋神宗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他那充满传奇的一生。他的一生是那么的短暂，他的晚年是那样的凄惨、悲凉，战争的失败让他内心痛苦万分，最终，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世间。

很快，神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王安石那里，王安石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没有办法面对既成的事实，经常彻夜喝酒麻醉自己。这个时候，王安石知道自己不久也要离开人世了。

他知道，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无论是生前有多么风光，住多么富丽堂皇的宅院，到了最终，也不过是那不起眼的一抔黄土。

在归隐之前，王安石就一直在为熙宁变法寻找理论上的依据，积极从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工作。经过自己的多次删改与考订，一部宏大的《字说》就此诞生。《字说》问世之后，当时的文人雅士都来学习，一时间竟然形成了一种风气，这多少给王安石的心里增添了些许的安慰。《字说》的成功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有用的，即使远离政事，归隐山林，他也可以为世人作点贡献。

神宗的离世，以及亲人的离开让王安石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尽管王安石作了最坏的打算，然而更多坏消息让王安石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

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后，开始任用守旧派的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为相，他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把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几乎全部废除。

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为此彻底绝望了，佛教与禅宗已经无法帮他排解内心的忧愁与苦闷了。每天，他都在书院中读书，常常望着远方深深地叹息，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悲苦，可是谁

又能够帮助他呢？世人只知他不快乐，却无法理解他不快乐的原因，悲伤与痛苦到头来还得由他一个人承担。



守旧派上台之后，朝廷变了样，政治迫害虽说还没有直接降临到他头上，但是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已经让人无法喘气了。他编的《字说》遭到了查禁，禁止看《字说》的消息让王安石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这个时候，他的亲友只好尽可能地封锁消息，害怕他继续受到刺激。怎奈纸是包不住火的，王安石虽然老了，但他一点也不糊涂，还是陆陆续续地知道了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被废除的消息。由于王安石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还是能够勉强支撑得住。但是，当他听说连“募役法”都被废除的时候，他再也支撑不住了，长叹道：“亦罢至此乎？”他认为，这些都是王安石与先帝商议了两年才执行的，根本不会对百姓造成任何损害，为何还要将新法全部废除呢？

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司马光完全是因人而废法，并不是因为新法的是非利害而决定取舍，而是凡是新法就一定要废

除，这样心胸狭隘的人独揽大权，国家怎能不一天天地败坏下去呢？

眼看着投入自己巨大心血的变法被一个一个地废除了，王安石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打击，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带着无限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中国历史上一颗巨星就此陨落了，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宰相；一位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一位性情豪迈、卓尔不群的拳拳赤子……

在王安石身后长达千年的岁月中，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然而不管怎样，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王安石，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中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第十九章 卓尔不群

王安石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他不愿意和流俗妥协，有的时候难免会给人留下一种不讲人情、不懂通融的印象。有人说，这是王安石最大的弱点，假如他能够灵活应变，稍稍屈服一下，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也许变法就不会失败了。

王安石是个不修边幅的人，平时有些邈邈，很多人就拿这个问题来诋毁王安石，其中就有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苏洵是一个快到三十岁才开始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他第一次见到王安石，就对他印象不好，到了后来，竟然发展到嗤之以鼻的地步，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觉得洗脸、换衣服是正常人应该做的，违背了人之常情，每天穿着破衣烂衫，而且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说着诗书礼乐，用来博取名声，这其中必然隐藏着极大的奸恶狡诈，而这种奸恶会发展成为危害国家的大奸大恶。很显然，假如仅仅是从这一点来进行判断，苏洵的观点太过偏激。事实上，古今中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没有

心思将自己打扮得和其他人一样，光鲜亮丽，而且，个人的穿衣打扮，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和“奸恶”没有任何关系。

王安石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他从来不会对上级的提携有所感激。前文已经讲过，王安石考中进士后，被授予淮南签判一职，是韩琦的下属。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办公时间，于是他经常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

韩琦误会了他之后，王安石却不辩解，只是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等到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有一种成为文学巨擘的架势，这个时候韩琦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他打算将王安石作为自己的部下，重点加以提携。没想到，王安石却并不买账，而且和韩琦的关系更加疏远了。

后来，人们在王安石的日记中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上司韩琦的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安石心气高傲，不愿做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拒绝朝廷的封官。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八岁位居高位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曾多次拒绝了朝廷授予高位之意，而且，他对于入朝为官，获得快速升迁没有丝毫兴趣，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期间，在他上任的每一个地方全部都是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让人惊叹。在他担任地方官时，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首创“青苗法”，结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王安石多次谢绝朝廷的美意，导致他的声望越来越高。最后，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希望能够

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假如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也太长了点；假如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实在是罕见的。

在王安石执政之后，他的这种固执则在更多地方都表现出来了。司马光本来同王安石是好朋友，然而，由于无法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又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开始强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竟然成了王安石主要的政敌之一。

“青苗法”推出后，神宗大力支持，反对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司马光不甘心，不断给王安石写信，前后近五千字，在信中，他毫不客气地对王安石进行了种种指责，说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惑乱民众，使得天下大乱，说王安石的做法不过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挑战全天下人。

和神宗谈论事情，王安石总是据理力争，并不会因为对方是帝王就曲意逢迎。和同僚们谈论的时候，如果意见发生分歧，王安石就勃然大怒，如果意见相合，就格外高兴。“话不投机半句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安石不屑同那些只知攻击新法，自己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争论。

司马光将责任全都算到了王安石头上，说他排除异己。对他的这种批评，王安石并没有进行辩解，他始终相信“清者自清”，不愿费口舌之争。司马光说王安石无视神宗的天威，其实，神宗自始至终都在利用两个阵营的力量相互制衡，而反对变法的人势力强大，神宗最后也受他们的影响，难免有的时候摇摆不定，他的态度对新法的推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王安石与神宗之间确实发生了多次争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王安石的坚持下迫使神宗做出了让步。神宗知道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会由于他犯颜而生气。

有的时候他一时想不明白，之后总会认真思考，找出自己的错误，及时恳切地向王安石道歉。正是因为神宗的这种优良品质，才让王安石没有太多的顾虑，一心一意为变革大业勇往直前。

第二十章 千古争议

王安石之逝，转眼近千年。

当年，在王安石去世之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也开始检讨自己。王安石的文采纵横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尽人皆知的，然而，他的变法却是司马光一直反对的。

王安石的离世，让司马光有机会可以彻底扳倒变法。然而这事却非常难办，对待王安石，当然不能像处理其他“熙丰之党”那样搞得太急，王安石后事如果处理得不漂亮，最后会给人落下话柄，而且也有点非君子的嫌疑。司马光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指示吕公著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司马光在信中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光对王安石唯一的肯定，就是他的文学才华。这也是司马光所不得不肯定的，因此，他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

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有一个叫周植的人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朝政“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希望能够给王安石一个正确的评价。

当时司马光的门下有一个叫刘安世的人也挺身而出，攻击周植“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植“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就在这些人对变法进行疯狂反扑时，另外一些人对王安石的离世却悲痛不已，“闻讣失声”，并且，自发络绎不绝地前去江宁，在王安石墓前洒酒祭奠，此举一时竟形成了风气，“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这些人中，以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为代表。他不顾朝廷的禁令，“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同时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祭丞相王安石文》，称“唯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他不顾个人安危，给了王安石非常高的评价。

之后一代大儒颜元也十分赞赏王安石，指出应全面评价一个人，不能囿于一时，“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擎柱乾坤者为小人也”。这种认识态度“岂独王安石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蒋士铨也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一诗中进行了说明，他说：“后来十九遵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另外，龚自珍先生有“少好读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手录凡九通”之说。

“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王安石政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有梁启超。在那个时候，有的人已经睡醒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变化，知道只读那些儒家经典根本就没有多大的用处，知道只讲“义”不讲“利”，根本就没有实际的用处，知道有气节和诗歌根本就无法挡住人家的坚船利炮了……一批

变法的志士们从历史中寻找希望，王安石于是就被记了起来。梁启超在《王安石》一书中，以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事业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为王安石彻底翻案。梁启超疾呼：王安石“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是千古奇冤。



梁启超对于国民的弱点认识得非常清楚，“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这也正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大行其道的根本基础，等到“王安石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事，然而，政见自政见，人格自人格，那些大儒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姬相谗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冒充好人，虚伪软弱愚昧，岂可与王安石相比？

梁启超多次讲：“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经过梁启超的一番议论和辩解后，事情向着积极的方

向发展，再加上人们也开始用客观真实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地位一跃而起，再次受到了政界和民间的一致重视。王安石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的成绩均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抛开一切关于新法的争论不谈，我们只要稍加理性分析，就能达成以下共识：王安石的人格是高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当时不得不变法，不能不变法；其变法的措施不全为错，很多内容现在仍通行全世界；王安石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是积极的，是锐意进取的，是要以强者的姿态立足于世界之上。

第二十一章 文学成就

王安石不只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将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一定要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以及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基本上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其所作大部分为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的空泛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

正是由于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部分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所阐述的政治见解与主张，主要是为变法革新服务。

而这些文章所针对的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纤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非常突出，他驾驭语言的能力也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笔力雄健。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文章主要是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他期望神宗在政治上可以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可以说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答司马谏议书》只有数百字的篇幅，主要是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非常严厉地进行反驳，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

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结构都非常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有非常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拔，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

酷似柳宗元之遗风；《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非常自然。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

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王安石的诗歌，基本上可以从罢相划界而分为前后两期，在内容和风格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他前期的诗歌大部分都是长于说理，倾向性非常鲜明，涉及了很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能注意到下层人士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描写，揭示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进而指出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主要反映了当时人们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

物功过得失的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使诗歌创作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因此题材的内容也比较狭窄，有很多的写景诗、咏物诗，主要是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是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佳作。

从诗体本身来说，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大部分都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则是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王安石的五绝和七绝更是享有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王安石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安石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其在构思、造句、炼字等方面都用心良苦，既新奇工巧又含蓄委婉，其长

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求工，好求工而伤技巧。所以说，“王安石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同时也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王安石的词，现今存了约 20 余首。虽不是以词名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被赞为咏古绝唱：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的这首《桂枝香·金陵怀古》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来说，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着非常高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都得到了大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做出了贡献。



然而，王安石的文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往往表现出了议论说理成分过重，却缺少形象性和韵味的特征。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巨星。



唐宋八大家故事集

文章巨公韩愈



乱世文豪柳宗元



一代文宗欧阳修



一代才臣苏洵



百代楷模苏轼



儒雅学士苏辙



变法通儒王安石



千秋醇儒曾巩

- 责任编辑 / 聂勇军
- 责任校对 / 汪欣怡
- 版式设计 / 马 佳
- 封面设计 / 罗 兀
- 图片绘制 / 罗 兀

ISBN 978-7-307-16288-4



9 787307 162884 >

定价：15.00元